

新新青年

辛亥百年专刊

创刊号

《新新青年》编委会

关于本刊订阅、批评和建议，请发送 e-mail 至 chinaenlightenment@gmail.com。我们会将每一期电子杂志第一时间邮寄给您，也会开辟读者来信专栏刊载代表性读者声音。谢谢关注！

2011/10/10

《新新青年》编委会

目 录

创世纪

- 4 发刊词
- 6 本刊宗旨
- 7 内容提要

震旦纪

- 9 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专访
- 15 舒衡哲(Vera Schwarcz)教授
- 17 纽约大学政治系熊玠教授辛亥特稿

志留纪

- 24 中华民国是什么？写给辛亥百年
- 30 共和的理想——听《卿云歌》

陆根纪

- 33 辛亥——
 四川的历史坐标
- 37 半是龙种，半是跳蚤——
 我眼中的辛亥革命纪念
- 39 双十记忆——
 一座城市的百年瞬间

青白纪

- 47 潘毓刚教授谈中国教育改革和留学生问题
- 49 黄克武博士专访——
 辛亥革命的论述与其实质

南华纪

- 56 辛亥百年：终结历史悲情 實現民族復興
- 58 后记

开天辟地，新新青年

创世纪

发刊词

这便是中国的青年

总有人感慨这个国家太老了，到处让人感到暮气沉沉；总有人感觉这国已经腐朽了，处处使人感到积重难返；也总有人认为那国是一个年迈的衰朽，背负着苦难而沉重的过去，恐惧着未知而充满凶险的未来。切开它的皮肤，流出的仅仅是泛黄的浆液，却非蒸腾的鲜血。

当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的时候，这个国家便快死了。有时是被打的，有时是自己得了没治的病，医生给他开了没救的方子，棺材也便打好了，傍边的众人指指点点，有人窃喜，有人也便是叹口气，只等咽气大火一把烧掉了事。每到这时，历史便会开一个大玩笑，这国家竟会活过来。

盼着他死的众人便惊了，是这个国家练了不死的功，中了长生的邪么？

不，是这个国家有青年。

这青年总会不吝惜地切开自己的血脉，目睹着汩汩的热腾的鲜血奔流而出，流入这个国家孱弱而颤抖的躯体。这一股股的鲜血便汇成了新的长江，新的黄河，新的大江大海，浇灌她苦难而悲剧的命运，扫荡她自私与怯懦的灵魂，涤荡她躯体内的千万万的天然惰性，变一老朽中国为少年中国，与天不老，与国无疆。

这青年是林觉民，是陆皓东，是辛亥革命的英烈群像；这青年是胡适之，是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青春之歌；这青年是邓稼先，是钱学森，是共和国先贤的两弹一星。这青年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抗日英魂，是两岸劫波渡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悲欢离合。这青年是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五四一代，更是理想主义激情燃烧的八零年代。

可你别看那青年血烧的那样旺，笑的那样好，他们却终也倦了，老了，死了。热血总会冷凝，

韶华总会老去，剧终总会散场，黄花岗的济世理想终将化为枯燥的历史概念，《新青年》的铿锵檄文演变为泛黄的苍老文字，理想主义的八零年代逐渐燃烧，熄灭，盖上了一层细密的历史灰烬。

诸位莫须悲伤，这便是那青年的宿命，便也是你我这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爱理想，有担当，生知其命，死得其所，当一代代青年挥洒热血，随着时代孤独老去之时，初升的朝日打在那个国家脸上，便多了两分希望。这希望微不足道，却重如泰山，因为它追求正义，向往良知，热爱自由，拥抱博爱，因为它来自于我，来自于你，来自中国青年中间的每一个人。

这便是中国的青年。

这便是中国正在增长的新希望与新力量。

这便是中国的《新新青年》。

2011/10/10

《新新青年》编委会

寄語

劍橋大學香港及中國事務會

这次很高兴获哥伦比亚大学张友谊同学邀请，在《新新青年》电子报刊登台湾中研院黄克武博士的专访。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它也是中国迈向自由民主的一个尝试。先不论它成功与否，它的确为一个世纪的中国人带来了一个现代化的理想。时至今日，两岸三地的中国人仍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尝试去实践着这个理想，亦因而对此理想的同一源头有不同的理解和想望。这份电子报，在我看来，是一个绝佳的平台让同在哥大或剑桥念书，却来自不同背景的同学分享对这个同样吸引着当年年轻留学生的辛亥革命的看法，在从这里开始反省它为现代中国—我们共同的根—的启示。希望各位读者能享受阅读《新新青年》编委会为你们预备的妙文，更希望这份电子报能成为剑桥大学香港及中国事务会与《新新青年》编委会具规模地交流的试金石。

2011/10/10

杨秉业

本刊宗旨

本刊宗旨所列如右

第一，自由独立。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根本的根本。我们不但要争取个体的自由和独立，而且要争取集体的自由和独立；不但要积极的自由和独立，也要消极的自由和独立。以自由民主之新新青年，建设自由民主之新新中国，自立于自由民主之新新世界。

第二，立足中华。海外留学生一大通病，即长期不以母语写作，长期不以母语思维，外语精进，而国语退化。更有甚者，沐浴欧风美雨，而丧失国族自觉，无视中国之事，不知有汉，遑论魏晋。本刊提倡华文写作，华语发声，关注中国，放眼世界。

第三，建立共识。海外留学生思想活跃，观点新奇，对于异议，当持开放心态，求同存异，多元共存。本刊务求展现多元观点，增进相互理解，以期凝聚共识，增进团结，量留学生之合力，造新中国之未来。

第四，放飞青春。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青年韶华，精光大盛，宜自我鞭策，日有进益，本刊愿永远以进取心态，激励进取精神，使人人皆成开拓进取、而非抱残守缺之新新青年，使未来之中国，不必留学即可得留学实效。

內容提要

本刊创刊，躬逢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成立百年，特此发行辛亥百年专刊，以此纪念中国共和之始。在震旦纪专栏，黎安友教授精彩点评中国百年政治，并以史天健先生的拳拳赤子之心激励后学，舒衡哲教授则瞩目哈佛三杰之一的吴宓，以期今日的中国留学生能再造爱国主义与现代化和谐共进的新局；在志留纪专栏，三位中国大陆留学生从中华民国史和两岸关系史出发，感悟中国百年以来在民族独立自由与民主共和政治上的不懈追求；在陆根纪专栏，三位中国大陆同学以地方史的角度体察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让历史的细节、时代的脉络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南华纪专栏，香港《中国评论》杂志副社长周建闽先生以化解悲情、共创蓝图期许两岸三地青年，并以孙中山先生建立富强、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的遗愿激励海外留学生；在青白纪专栏，熊玠教授和黄克武院士均从政治学视角审视辛亥革命的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时空环境下的解读。

《新新青年》自创刊号始，就在实践着自己的宗旨：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争取国族和个体的独立和自由，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走出，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人则不断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实现；辛亥革命是近现代中国划时代的事件，讨论辛亥、讨论民国，就是在讨论今日中国的根，也就是在思考中国的明天；对于辛亥革命，本刊不但尝试从大陆、台湾、香港、海外四个角度进行评析，而且在四个视角内部也是多元并存，比如武汉视角和四川视角，等等，力求完整的呈现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并求取最大公约数，寻找国人对于辛亥百年的共同理解，正是在这种共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民族凝聚力；评论辛亥革命，并不止于 1911，也不止于 1949，而更多的是面向现在、面向未来，本刊所展现的辛亥叙事，不是在故纸堆中钞古碑，而是朝气蓬勃，发万古未有之豪情。《新新青年》的创刊号，所体现的精神，就是自由独立、立足中华、建立共识、放飞青春。

震懾古今，泱泱华旦

震 辰 日 一 紀

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专访

编者按：黎安友教授关注中国半个世纪之久，对于中国的政治机理、政治文化、两岸关系和对外政策都有独到的见解。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震旦社同学的采访时，黎教授风趣幽默、旁征博引，而且中文地道，让采访同学如沐乡音。除对中国政治的评论外，黎教授还特别谈到重新访问中国的问题，以及让他敬重的中国朋友，如英年早逝的史天健教授。斯人已逝，只看吾辈！



黎安友（英文名：Andrew James Nathan），美国知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前东亚研究所主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黎安友是汉学家费正清的学生，而他本人也指导与影响了当代华人知识群体许多学者，包括清华大学政治系的孙哲、刘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张健，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吴介民，以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系的蔡欣怡等。主要著作包括：《中国的民主》、《中国政治变迁之路》和《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寻求安全的战略》等。

1、您的早起学术贡献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派系模式，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派系斗争。您是否认为派系是解读百年来中国政治的钥匙？派系在辛亥革命一百年后的中国还发挥重要作用吗？

我认为派系的作用是一个变数，并不是一个会永远存在的文化框架。这取决于实际情况，取决于体制的力量。你比如说邓小平的一个成就是他能够超越派系，他能够建立一个更制度化的体制。最近有一本新书叫 *Deng Xiaop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作者是傅高义(Ezra Vogel)。傅描写到左右派系的因素，邓小平慢慢建立了一个更制度化的体制，包括分工的原则，就是说你管你的、我管我的。比方说，最初主要是让陈云解决一些经济宏观的问题。之后慢慢就形成总理管经济、银行系统、外汇，书记管政治、安全等等。他不太让一些退休的领导或者一些别的领域的专家介入某一个领域的工作。还有邓建立了一个干部退休制，所以老干部退休最初并不是真正的退休，但是慢慢地形成了一个“退休就是退休”的这样一个原则。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不太强调忠诚，而是强调靠能力来提拔人才。他提拔一个人之后会观察这个人的工作，工作不太成功的话邓也可以不用他，即便他跟邓有关系，像胡耀邦，包括赵紫阳。邓会依靠一个人，直到他的工作从邓的角度看不那么成功之后，他也可以无情地放弃这个人。这个作法实际上很健康。所以你跟邓的私下的关系怎么样无关紧要。实际上，他跟他的部下没有什么私下的关系。邓这个人，他跟人工作的方式是比较陌生，只谈工作。

派系这个东西在军阀的时候很强大是因为没有别的可靠的制度，因为政权很衰弱。到毛的时代这

个是因为毛自己把个人效忠当作最高的价值，然后自上而下纷纷效仿。邓以后这个派系的因素比较弱。当然还存在一些，比方说主流、支流等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的观点，这个也可以叫做派系。但是这个派系跟毛时代的派系不一样：思想派系、政策派系和毛时代个人的权力派系是两回事。

- 2、最近几年，中国大陆兴起民国热，今年恰逢辛亥百年，中国政府于国庆前夕在天安门前树立巨型孙中山像，网友更是热衷于讨论辛亥和民国话题，并有意将民国时期的大陆、今天的台湾与今天的中国大陆进行比较。您认为研究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具有现实意义吗？民国到底是过去还是现在？**

这个问题我作为外行可能不完全知道，因为我没有时间特别注意这个所谓民国热。但是我估计，（如有误请纠正我），民国热之下一个含义是中国的民主化。在民主化的范围内研究辛亥革命的涵义一定有现实意义，因为中国未来和现在民主化的程度，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民国到底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的精英都有一个共识，要从专制转向民主，这个好像是辛亥革命的一个根本思想。但是民主这个概念从很早开始是一个争论点，民主到底是什么。所以在清末民初精英大概把民主归到宪政这个意思上。民国早期的选举法规定不是大家都有权利投票。但是它的宪法除了这个问题以外非常民主，有总统、有议会、有总理、有内阁，是一个内阁制。但是因为国家能力不够，所以不可能真正实现民主，这与很多西方的理论家的想法是一致的。民主与弱国绝缘。民主不等于弱的国家能力，民主的涵义应该是以强国为基础，建立一个能适应民众的要求和民众的思想的国家。

- 3、三民主义是辛亥革命的主要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主张排满革命，民权主义主张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主张公私两利。中国大陆第四代领导集体上台以来，其政策被概括为新三民主义，普遍认为在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和增进民众基本福利层面颇有进展。那么，您认为胡温在推动大陆民主政治上有何进展？温家宝总理最近几年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特别是上个月在大连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有何特别含义？胡温明年即将退休，您对他们十年政绩如何评价？**

在民主这个问题上，我属于悲观派。民主这个问题谁都能够谈，包括最恶劣的暴君他们都谈民主，现在没有一个暴君不谈民主，包括沙特国王，包括卡扎菲，包括金正日。光用民主两个字不等于说要实现民主。

温家宝总理以及胡温这个体制是做了一些我自己认为非常美好的（wonderful）事情，就是说他们不断地建立一些新的机制让国家机关更适应民众。当然，适应民众是民主的一个基本概念，但暴君也可以适应民众的要求。古典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利说要成功地巩固一个暴君的权力，你得掌握民心，或者要强调宗教、或者强调你的慷慨、或者强调你的什么东西让大多数的人民爱你，你才能镇压少数的对象。毛也谈过，他说我们要联合百分之九十五，要孤立百分之五。联合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这个概念部分地说也是一种民主，但是我自己认为，而且西方的理论家普遍认为，真正的民主需要放一部分的权力，放最后的决定权给公民。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对最低民主（minimal democracy）的定义是说要保护个人的政治权利，这

个政治权利包括言论权，结社权，选举权，要有真正的公开的选举，这个选举决定最高掌权者的人选，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我自己的分析当中认为，胡温他们两个都要巩固共产党执政，用各种方法跟民众协调，跟精英协调，跟党外协调，跟各个社会力量对话，做出一些让人民满意的好事来巩固共产党执政。所以我是所谓的悲观派，因为他们不是要建立西方式的民主。但他们不要建立西方式民主的理由我也懂，就是说他们怕风险。他们认为现在一党执政能够为中国做出一些好事，它能够发展经济，它能够发展国际力量，它能够维持社会稳定，没有必要的放权很危险，这是他们的观点，我明白。

- 4、近年来您曾经参与亚洲气压表调查，发现中国大陆新的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度高于日本和台湾的政府支持度，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依然能够继续通过政治绩效，比如经济发展和民众福利来取得执政合法性吗？

是的，当然如此。从政绩特别是具体政策的政绩方面，中国政府在胡温体制下、包括在江泽民和朱镕基治下做出很大成就，之所以一般中国人认为动摇这个政权不是时候，是因为我自己今年的生活水平比去年提高了，或者你们年轻人的展望是比较乐观的，自己可以成功，自己可以找感兴趣的工作，获得可观的收入等等。但是依靠政绩合法性的危险在于你的政绩一旦有问题的话，你没有可靠的来源维持合法性。在日本和台湾，包括在美国，老百姓对于政府的政绩非常不满意，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推翻这个政权，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更服膺的政权，他们还认为这个政权的政绩不够，但是从政权类型来说还是最合法，所以日本人现在不想要军人来管国家、也不想要一党制、也不想要天皇来管，是因为他们认为还是民主最合法。在中国的话一碰到比如说通货膨胀、或者对外战争失败、或者共产党产生一个像勃列日涅夫那样无能的领导人，就会产生危机。因为共产党提拔官员的办法是在党内找接班人，如果这个接班人可靠，他懂政治、懂政策、有经验，那么中国就会平稳发展。但是也有一个危险就是选择一些能爬党的楼梯的人，他没有创新的力量，或者不开明。这种现象过去没有：江泽民虽然在国外形象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还得承认他的成就是不错的；胡较缺乏个人魅力，也不大符合西方人对领袖的口味，但是我们也得承认他有足够的管理中国的能力。根据我的判断，习近平也有政治能力，但习以后的人，或者习以后的再下一代会不会产生无能的领导，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在西方产生一个无能领导你可以替换他。所以每次选举，政客们都会绞尽脑汁想出新鲜方案，但这也有危险，比如乔治布什，他也有新鲜的概念，但我自己认为并不好。

- 5、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文化呈现“百家争鸣”的格局，儒家文化、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文化、公民文化，同时辛亥革命也开启暴力革命的政治。今天大陆出现的政治思潮被归纳为新自由主义、新左和新儒家三派，也有学者指出权力资本文化是今日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之一。您认为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怎么样，如何看待今天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

这是个巨大的话题。我自己倾向把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分开，政治思想是思想家通过写书、写文章和辩论表达出来的，比较抽象；政治文化，我们把它归纳为老百姓的普通价值观。你知道史天健，我认为他做了对中国政治文化最好的抽样调查，他的结果总的来讲可以这样说：中国现在老百姓的政治观点、政治价值观，传统的价值观也有，所谓的现代化和非传统价值观也有，是混合

的文化。任何一个国家，日本、美国都会有这样的混合的价值观。但是天健认为，亚洲，特别是中国文化覆盖的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也多少表现在朝鲜、日本，也就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各国，在传统思想比较强调两方面。一方面不能光总强调个人利益，要公私结合、公私两利，从西方的观点看，个体可以为了集体利益做一个牺牲，但中国人宁可把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合并在一起，认为个人的利益依赖于集体的利益。这个集体首先是家庭，但是也可以提高到社会或者国家这个层次。中国人也比较容易接受这个概念，我个人的存在依赖于国家，依赖于集体的利益，这个传统的思想在中国比较强。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和谐的概念，斗争和冲突无法避免的话，还是要斗争，但要尽量避免，尽量要跟大家配合、和谐。西方不那么追求和谐，他们比较看重个人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无限斗争。天健会认为中国老百姓的文化是比较重视和谐这个概念。另外，他通过分析发现，年纪大的比较传统，年纪轻的比较现代化，农村的比较传统，城镇的比较现代化，女的比较传统，男的比较现代化，他用抽样的调查资料做了非常细的分析，以这个分析为基础，中国越来越迈向现代化的步伐，老人要“过世”，年轻人要长大、要掌权，农民要转到城镇里去，中国的政治文化会慢慢地现代化。但全球没有一个国家是百分之百的现代化，这个传统文化价值观还存在，比如美国的茶党（tea party）就代表一些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也会反弹。所以根据天健的定义，我认为中国大陆政治文化比较传统但是它正迈向现代。我的另一个博士生，他的博士论文探讨了政治文化的另一个层面，有关知识分子的思想潮流，虽然是五年前的，但结论还是正确的。他说新保守主义、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思想比自由派思想的影响力更强，这里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以前也说过政府能够给大家更好的物质生活的话，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支持度。新左派也是批评，指责政府太资本主义。但是各种各样的支持专制的思想包括新左、包括新保守、包括新权威主义，虽然它们不尽一致，但都不是自由派，都是反自由派。我只能说现在自由思想比较衰落，不是说我希望这样，而是我的观察。

6、您觉得随着时间推移，年轻人掌权，老人推出历史舞台，政治文化的变迁会不会预示着政治体制的变化，请您做个预测。

你们作为年轻人的代表，我认为，你们应该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向你们学习。我知道年轻人，包括四十来岁、五十来岁的中年人，他们的思想普遍很开放。但是开放这个概念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因为他们是专家，在专业里面有开放思想，比如说经济管理、企业管理、教育界，都很开放，但这个开放是不是包括一定要推翻一党制或者改进一党制，则有很大疑问。在西方这个区别被看做是重要的区别，在国内则被看为是次要的，认为你只要为了国家的强大作贡献就行了，而国家的强大不一定要引进西方的思想框架。反倒是西方的思想是偏重意识形态的，这是个讽刺。因为我们过去说中国是很红，很意识形态化的，什么都要从意识形态说起。但是中国现在很多务实，相反西方比较意识形态化。西方在辩论中国未来的时候，最终都会归结到或者民主或者不民主这个问题上。

7、您对台湾政治和两岸关系有着长期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马英九上台以后，两岸关系和缓，大陆政府也对台频频释放利多，但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和统独观念却比陈水扁时期更令大陆担忧。根据政治大学今年 6 月份的民调，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比例却达到历史新高（54.2%），自认为是中国人的比例达到历史新低（4.1%），而自认为两者都是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却长期保持较高水平

(39.9%)。另外，在统独问题上，赞成维持现状的超过半数，虽然急统和急独比例都不高，但偏向独立的人数确是偏向统一的两倍，而且两者差距一直扩大。为什么大陆政府的善意得不到台湾民众的回应？您认为大陆对台政策应该如何调整？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认为，作为美国人，我们经过很长、很痛苦的族群关系的演变，并从中得到了一些教训。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族群关系多么理想，至少我们经过一些经验得到一些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要尊重别人的“自我认同”(identity)。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马克思受他的影响很大。黑格尔强调一个人的存在是要得到其他对象的承认(recognition)，我需要你知道我在这儿，我是一个人，而且你也需要我认识你是一个人。他认为一个人需要得到别人的认识、承认、尊重、认同(认可)，才能感觉我自己就是自己。你对于台湾人提出这个问题说“你为什么不认识大陆对你的善意”，他不要你的什么善意，基本上他要的是你的承认、你的尊重，西藏人也是这样。但是坦率地讲，中国大多数的汉族可能不那么尊重少数民族、或者台湾人、或者香港人、或者外国人，包括黑人和白人。这种至少不那么诚恳的尊重大概是因为汉人碰到非汉人的机会不是那么多。美国我们不同族群混在一起，我们经过很长时间的斗争才意识到求同存异的重要，我们得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他们的自尊与自我价值。但中国的汉人没有这个必要，少数民族在边疆，你不是经常碰到他，你一碰到他们，你的权力比他们多、比他们大，就作他们的大哥。但台湾人之所以不那么感激大陆的物质上的善意，是因为他们要求的是精神上的善意。但是你给精神善意，多少有一种放权的意思。也不可以把这种尊重作为一种工具，不能说尊重你是为了控制你，太有目的性。所以要真正尊重台湾人，要尊重他的自决权利。但是他真正的自决权利很危险，因为他可能决定会要离开要独立，这是一个矛盾，我认识这个矛盾是一个真正的难题。但是，无论如何，台湾人的骄傲可能很多大陆人不那么理解，他们的骄傲源自于很多方面：他们政治的成就、经济的成就，他们生活方式(他们认为自己是很好的生活方式)，他们做菜的方法，他们的文化、文学、小说、歌剧、音乐，等等。但是大陆不那么认为，因为首先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8、民族主义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影响中国的重要意识形态。近两年中国大陆在东亚地区面临诸多挑战，例如2010年钓鱼岛争端、今年的越南排华事件以及南海主权争议，等等。您认为这些议题的发酵是否会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升？

我自己的观点与其它一些学者，如谢淑丽(Susan Shirk)的观点稍有出入，她认为中国的外交决策只能按照老百姓的民族情绪做事，一旦违反这个情绪就会倒霉，因此他们不能在台湾问题、日本问题上让步。我不同意的原因是：在中国，民族情绪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但当局可以把它压倒比较低的层次，或者他们可以把它拉到高潮，政府还有相当一个空间可以控制或者左右这个情绪。我不是说这个情绪是当局产生的，我不是说它是伪情绪或者什么东西。它是存在的，但是当局多少能够控制。第一能够控制大众受到的信息，虽不能百分之百地，但是可以控制相当的一部分。第二还可以控制信息的处理，把它扩大、减少或以其他形式处理，这个是政府可以解决的问题。它可以给很多符号，让大家知道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也可以或者允许、或者防止大众的游行示威、或者激发大众的其他一些行为。所以，2005年反对日本的游行是政府先刺激，以后允许，再以后停止，为了自己的外交目的，要给日本看，两三个星期就停止了。所以我认为和

西方国家来比的话，中国的决策者还是有更多的选择的空间。

- 9、众所周知，费正清先生是美国中国学的奠基人。作为费正清的高足，您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谈到费正清对于中国所关注的，不是那些已经引起学者注意的话题，而是那些尚未被涉足的领域。您认为中国研究中还有哪些盲点值得我们后学关注？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认为现在的教授不能扮演当时费正清扮演的角色，因为现在中国研究比过去发展得更充分，人也多，机会也多，资料也多，现在中国也开放了，大家也可以去中国做田野研究、调查。我认为在费正清的时代他有一个框架，这个部分要做，那个部分要做，构成一个整体的项目，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没有一个框架，中国问题研究有自然发展的规律，所以我比较强调研究生自己选感兴趣的题目，他选什么我就会帮他做。

- 10、最后问一些个人问题：如果您有机会重新到中国大陆旅行的话，您会首先去哪个城市，去做什么？您所结识的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朋友中，谁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过去去中国，我比较少去大城市，比较少去北京、上海。现在还是想去这种地方。河南、四川、福建都去过了，要去我以前没去过的地方，要了解草根的生活，地方上干部的一些关怀，因为中国地大人多，所以社会非常多元化。我要能回去的话，可能会去一些我以前没去过的地方。你所结识的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朋友中谁让你影响最为深刻，这个不敢说。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在一个省会有一个老朋友，他是一个退休的老研究员，一个省级社科院的研究员。他的生活方式非常简单，一般我去中国都会去找他，我们会一起去一些地方，他带一个很小很小的袋子，带一个已经坏了的旧眼镜，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和他一起旅游非常愉快。在台湾有个老朋友也已经退休，叫张朋园。张朋园是一个历史学家，我每次去台湾要见他。当然还有史天健，他是我最青睐的人之一，因为他对社会科学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他为了进行最深入的最基层的社会调查，做了太辛苦的工作，这个可能也和他的过早去世有关系。你知道他和清华大学政治系的关系，他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世界级的政治系努力辛勤工作，可惜不幸早逝，但是他的工作别人会继续干。

舒衡哲(Vera Schwarcz)教授

编者按：舒衡哲教授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有着深入和独到的理解，曾在 80 年代初亲自采访张申府、巴金、冯友兰等著名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舒教授特别指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之路，并特别指出吴宓在辛亥一代知识分子的独特角色。



晚年吴宓

舒衡哲，Vera Schwarcz，汉学家，生于罗马尼亚，犹太人，耶鲁大学硕士，斯坦佛大学博士，康州卫斯理大学东亚学教授。1979—1980 年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专研中国现代思想史，历史记忆等领域。

著有《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1986)、《张申府访谈录》(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1992)、《在断裂的时间之河架桥：论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文化记忆》(Bridge Across Broken Time： Chinese and Jewish Cultural Memory，1998)

韦斯利安大学东亚系教授、美国著名汉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女士谈辛亥百年中国知识分子

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1911 年的改朝换代并不意味着开天辟地、急剧转型，即便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也游离于中国和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我们必须了解他们将过去有机的融汇于现在和未来的理性追求。

吴宓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早年就读哈佛，师从白璧德（Irving Babbitt）教授，曾试图将佛教教义与儒家思想融合成新人文主义。时逢辛亥革命 100 年，我们应当回顾与重塑这种温和转型的声音。

吴宓在 1924 年对 Irving Babbitt 写到：“中国的民主将会依照其领导能力和愿景来鉴别。”这在今天的中国和西方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重新思考民族主义和现代化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使两者免于冲突。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今面临十字路口……如今，海外中国学生学者有独特的机遇去批判性的思考 1911 年辛亥革命和其他事情。中国的未来在于如何紧迫的去抓住这个机遇。

链接：吴宓的 1911 转载自《中国经营报》2010 年 11 月 15 日

吳於當年 2 月初抵京，參加清華學堂入學考試。按照規定，即使考入清華，也尚需四年方有

資格赴美留學。其實吳宓之前已接受較為系統的中學教育，但為了圓留洋夢，吳心想“將來果能靠住往新大陸一游，則靜待幾日亦無可奈何之計，否則機會不易得也。”但當時留學生多為“富二代”或“政二代”，終日游手好閑，他們靠老子的錢和權買通校方，壟斷出國名額。於是乎，棄學東渡之念閃過吳宓腦際。東渡便意味失去留美機會，留守仍需忍受各種怪現象，吳不免於此兩種選擇間猶豫徘徊。其日記裡對此心情有著極真切地記錄：“人生最苦莫如心有兩事，未知所可，交戰於中，實覺難受。且人更不可心動，余心已動，直怦怦不能自己。”一番思想鬥爭後，吳終放棄東游之打算。

然後時局的驟變已不容許吳宓安心於清華求學了。武昌事起，京城謠言四起，人心惶惶，清華“學生有出校回籍者。而同班之中，亦有若干人請假入城，偵探消息，藉作逃計。殊覺惶惶異於常日也”。同時“本校中國教員，多半已皆辭職回籍”。此刻之吳宓，反而天真地認為革命軍難成氣候。這其實與其腦中較為濃厚的衛道思想有關，即使到了民國六年，一次他在火車上遇到張勛的辯子軍，竟還賦詩贊曰：“健兒喜道年時績，白下將軍破敵歸”。也正基於此因，當同學紛紛離校避難時，吳還故作淡定，以為“能經此一番離奇變遷，目睹而心識之，亦人生不可多得之幸事也。”不過隨著風聲一日緊過一日，吳宓內心也波瀾起伏，再度糾結起來。

看著學友東奔西逃，聽聞戰局風聲鶴唳，吳“終日心中忐忑，至不靜適”，忽而欲赴滬避難，突然又決定“靜居以觀后變”，實則心亂如麻，手足無措。至 11 月 8 日，吳終得解脫，學堂宣布暫行解散，每人補助旅費 20 元。吳便收拾行裝，於次日奔赴上海。臨行前，吳於日記中寫下頗為傷感的一句：“回顧清華園風物，愴然欲涕，未審他年得一重睹此景否耶？”此話究系眷戀清華學堂？還是嘆惜學業中斷？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后人恐已不得而知，但至少我們透過其日記，察覺吳宓之內心依然極度糾結。

纽约大学政治系熊玠教授辛亥特稿

由政治學眼光註釋辛亥革命的啟示、兼論其對嗣後中國發展之歷史意義

转载自香港《中国评论》月刊 2011 年六月号

编者按：熊玠教授是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先进，对中国现代史和两岸关系有长期观察。熊教授此文从政治学观点评析辛亥革命，对于晚清政治结构、革命党动员能力和民族主义兴起做了详细的阐述。



熊玠，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美国政治学会、国际问题研究协会、亚洲问题研究协会、国际法协会、中国问题研究协会会员。与美台上层关系颇深。与美国前总统卡特、里根有一定交往，与美国国会有密切关系，1979 年曾参加起草《与台湾关系法》。

導言

辛亥革命(1911) 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意義至為重大的轉戾點。一般論者均知其重要性在於終止了幾千年來的帝王統治制度、帶來了一個劃時代的現代政體。個人認為辛亥革命的意義遠不止此。從政治學的眼光來看，檢驗辛亥革命的前因後果以及滿清一代的背景，可讓我們對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 有一個更深一層的認識。

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面臨西方勢力集體入侵的進犯與蹂躪，正值十九世紀清朝在經過近兩百年盛世之後而轉趨衰頹之際。一時內憂(回亂、捻匪、太平之亂) 再加外患層出無窮。但清庭在面臨燃眉之急卻因種種原因(包括慈禧太后之蠻橫跋扈，但並不只此) 而墨守成規，無法革新以自拔。然，朝野憂國圖存的努力，可劃歸為四大運動或方案。先後分別為(1) 自強運動(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體用』倡議)；(2) 改制(康梁變法)；(3) 緩和性民族主義(立憲派) 方案；(4) 革命性民族主義運動(即革命運動)。當時主張與追求革命者，以孫中山所領導的同盟會成員為主(在1911 也有部份立憲派參加)。他們在1906至1910年間發動了為求推翻滿清的九次武裝起義，均告失敗。但在1911年第十次起義，成功地奪取了武昌，然後各省先後宣告獨立。清庭命袁世凱應變調停無功、見大勢已去乃宣佈遜位。從此中國帝制朝代更替的歷史，劃上永遠的修止符。是之為辛亥革命。

如果歷史不可切斷而有其自己延綿發展之邏輯的話，那麼辛亥革命既是歷史的產物，又是為中國之未來鋪下了必然的途徑。

以下，我們要探討兩件事項。(1) 清庭遲遲未能改革，究竟為何道理？我們更可以由此體察清庭遺風對未來發展的影響，包括為何某些受過西方教育的精英以後要否定傳統中國文化。(2)

『民族主義』于清末因中國飽受帝國主義欺凌而抬頭騰飛後，其長遠意義及所起之作用為何？

辛亥革命前的滿清政治情況

(一) 中國在清朝的政治結構情況。由於滿清是以一個少數民族征服了漢族的多數民族而成立，在1644建立了清朝以後，長時期擔心漢人造反，故而採取了某些特殊措施。譬如全國遍布八旗軍，駐紮險要重鎮；形同一個『衛戍政體』(garrison state)。政府設立 督撫制度，雖曰滿漢共治，實則用滿人任總督以監控漢人之巡撫與州縣以及整個官僚體系（包括軍勇）。地方如有戰亂，朝廷則派欽差大臣（代表清帝）督導地方督撫應急，以確保地方官員絕對效忠于皇上。官宦之途並設迴避制，即任何人不得回歸自己省籍擔任父母官（譬如江西人不可回江西作縣令），以防私相授受。為了廣為防範漢人謀反，清庭鼓勵讀書人攢營章句小楷、講究八股文章；並以琴棋書畫打發其多餘時間等等。清庭對漢族讀書人不放心，可從清初文字獄繢繢中看出。

(二) 人文現狀。滿清一朝于1644建立之初，中國人口僅及半億（1650年代）；至1840人口已增加八倍，達四億之多。漢人雖然可賴科舉仕途昇遷，但滿人的王爺貝勒，實為永遠的世襲統治階級；其人數之多，遠超過前此任何朝代的王室。無形背逆了歷來開科取士促成社會昇遷的精神。

(三) 滿人入關之初，王族嚴然形同僧侶，紀律嚴明。殆至乾隆時期，已贓賄大獄累出無窮。和珅二十年宰相所聚斂財產八萬萬兩，超過了國庫歲入十年的總額。貪贓腐敗之風並沒有因為和珅被嘉慶皇帝處死而中斷。

(四) 清庭在十九世紀面臨內憂外患之際，其延續自己之慾望遠超過革新中國之需要。何況在洪楊之亂後，更有理由拒絕革新以求自存（見下）。

洪楊之亂對清庭所起的震撼與後果

洪楊之亂（亦稱太平之亂，1850-1864），可說是奠定了滿清覆滅的基礎和預期辛亥革命的成功。有以下幾點，值得一提：

(1) 八旗綠營相繼廢弛，已無法對付洪楊之亂。欽差大臣制度也已失去其作用。看來半壁江山已告失落。清庭不得不起用諸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漢臣，率領來自己家鄉之子弟兵（湘軍、淮軍等）應戰，終將叛亂平覆。自此，漢人之權勢大增，督撫地方軍抬頭。亦造成軍隊私有制之殷始。洪楊之亂以前，清庭所設總督八人中，滿人佔2 / 3；漢人僅佔 1 / 3。巡撫18人中，漢人佔2 / 3。但在洪楊之亂後，漢人佔總督之2 / 3；佔巡撫之90%。中央政府原先滿漢2 比1 之比率也已推翻。曾國藩、李鴻章等漢人開始拜相。

(2) 更重要的是，清庭深知漢人精英之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甘願輔助清庭的滿人，消滅了也是漢人領導的太平天國之亂的道理，乃在洪秀全反對儒家、並以耶穌基督兄弟自居，因而侍奉『天父天兄』。相反地，清庭雖是滿人，卻尊孔倡儒。所以，曾、李、左諸人為了要消除反儒的太平軍，甘願為滿人的清庭效力。（近來，有人以曾、李、左等漢人不幫助同是漢人的太平運動而反為甘願作滿清之鷹犬而加以垢病。均是未能了解其中之微妙道理。）

(3) 洪楊之亂既平，清庭慶幸由于它尊儒擁孔才得苟延殘息；所以從此決定更加堅持尊儒不變。認為唯有如此，方能繼續得到漢人精英之擁戴與忠心。才能確保滿清的江山。此所以清庭堅持不變之真蒂；更誤認堅持舊禮教與舊制度就是尊儒。鑑諸此，各地凡有小規模西化自強之努力，譬如漢冶萍煉鋼與江南造船業等，均是地方漢族官員(如張之洞、李鴻章等)在自己轄區內所施行的創舉。然而西方國家船堅炮厲，一再向中國進逼掠奪，毫無止境。等到清庭非變不可時，又誤信是儒家思想不利革新，乃于1906 幣除科舉。這更助長了革命黨人的陣營(見下)。

辛亥革命成功之要素

由政治學眼光來分析，辛亥革命有幾項要素，包括(1) 革命領導精英；(2) 革命之號召(驅除韃虜；復興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3) 革命運動的組織(興中會；同盟會；革命黨；文學社；與共進會)；(4) 革命戰略(發動城市進攻；再加暗殺)；(5) 巧合與機遇(譬如慈禧與光緒同于1908 年去世)。我們以下對第(1) 與第(5) 略加申述。

*反清革命自初期以來之參預者與領導精英，很多均受過西方熏陶(譬如孫中山即是受的西醫外科教育)。中國傳統的士大夫階層，總數不過佔全國人口2.14% (相較于日本協助明治維新的『武士』精英佔全國6%)。本來人數就不多。但因礙于科舉的約束，很多知識份子最初對革命的號召，多裹足不前。但科舉制度在1906 取消以後，原來兢兢業業的學子，發覺他們十年寒窗的辛勞與夢想頓時破滅。一夜之間，很多義無反顧地參加了革命陣營。所以在五年後的1911 (辛亥年) 革命黨人第十次之役，能夠一舉而拿下武昌，恐怕與這些生力軍之參加，不無道理。

*1911年七月在川、漢、粵各地因『鐵路國有』糾紛，而發生清庭為『保路』出兵而有『格殺無論』事件。引起絕望之商人倒向革命黨人。再加幫會之協助。清庭所練新軍，本是最有現代訓練也是最富現代頭腦的人員。經文學社之蔣翊武等聯絡與策動，已產生很多不滿份子深藏其中。是年秋在同盟會推動下，文學社和共進會在武昌設立起義總部，準備發動新軍起義。由於計劃泄露，起義機關被清軍破獲。形勢危急。10月10 日晚，新軍工程營熊秉坤率部首先起義。各營奮起，攻陷總督衙門，佔領武昌。鄂督與新軍統制及文武大小各吏，皆嚇破膽而倉促棄城逃遁。武昌遂為革命軍所有；繼陷漢陽、漢口。革命軍成立湖北軍政府，推新軍協統黎元洪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革命軍鄂軍都督。並發表宣言，號召各省起義。各省相繼響應。形成席捲中國的辛亥革命。

清庭腐敗與拒變在辛亥革命以後造成的流弊

儘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更終止了帝制，但清末遺風對後世的某些不良影響，吾人不可不知。

(甲) 洪楊之亂後，清庭元氣大傷，國庫空虛。不得已而有『捐官』(賣官) 之舉。一時在科舉功名之外另有『捐生』(美其名曰『監生』) 之列。以後在民國以來不同政府均偶而發生類似賣官之陋習。別的不說，就是在陳水扁任期內，軍隊將領居然可以買官晉級。醜聞因監察院徹查爆光時，發現在他任期八年中有732 軍官晉昇。

(乙) 洪楊之亂由于曾、李、左諸人均靠統領子弟兵方能將之平息，從此開了民初有軍隊私有制之始(已如上述)。再加袁世凱北洋體系傳統與勢力，在清庭推翻以後而正式政府未能確實建立之前，遂有軍閥割據(以及搞派系與小圈圈)局面，達20餘年。縱使在北伐成功而南京政府(國民黨)成立以後，歷經抗戰、勝利、復員以至國共內戰期間，各地軍閥勢力(以及派系)仍未有徹底消除。

(丙) 由于洪楊之亂後，清庭以為只要尊儒擁孔即可得到漢人臣子與全國漢人中堅之擁戴，更誤以為墨守成規、堅持舊禮教就是尊儒(也已如上述)，無形在民間製造了一個假象。一般人(尤以某些喝了洋水的知識份子)誤以為是儒家思想拒絕改變，並因此斷定儒家誤國。故乃有人在滿清推翻後奮臂高呼『打倒孔家店』、『線裝書扔毛坑』，一時也得到相當的回響。因此孔子沾污垢面近八十年，在中國大陸直至1995年以後方稍有轉機。

(丁) 滿人統治中國，荒廢歷來中國朝廷之御史制度，廢除一切足以防範皇帝過份極權專制作風之傳統。朝廷對外是『天朝』，臣子在皇帝面前永遠自稱『奴才』，極盡奴顏婢膝之能事。似此皇帝與臣子間之差距，是以前歷代之所未見。再加無論在中央或地方政府，也無論官至幾品，均有滿人監視漢人之陋規(已如上述)，造成官官彼此猜忌。皇帝對臣子並有絕對監控渠道，甚至朝中大臣昨夜博奕(打麻將)輸了銀兩若干，一早上朝時，皇帝已經知曉。這些均影響了民國以來政府專制與官僚(包括現代西廠)之作風。

辛亥革命、孫中山理想、與百年來中國社會結合演變之鳥瞰

辛亥革命的次年(1912)『中華民國』誕生。象徵了中國從此有一個由人民組成以代替帝制王朝的政體。此次革命的共主孫中山先生被推為臨時大總統。雖然不久就讓位于有軍事實力的袁世凱，但在國人心目中，孫仍是民國的『國父』。在辛亥革命後一百年的今日回顧，我覺得有三點總結，我們不得不認知，才算對中國近代史有確切的掌握。

第一，由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民族主義』，從今日回顧看來，是較為持穩而偏右的一股力量(後來成為國民黨)。另外一股『革命民族主義』力量，則是更較激進的由毛澤東代表的左派勢力(共產黨)。在我們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我們可以總結的說：近一百年來，正是由現代革命民族主義這兩股力量支配了中國國家與人民。到現在仍是如此。在台灣的政權與社會，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後而建立的『中華民國』的延續，代表了當時革命性民族主義的較保守的一股力量。而在今日大陸的政權與社會，是代表同樣革命民族主義的另一股力量。雖然二者在意識形態上以及政體作風上有如涇渭之分，但個人認為二者同是中國現代革命民族主義的產物。孫中山的『驅逐韃虜、復興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號召，可說不僅是當初革命黨(後來之國民黨)的目標。在很大的成份上也是所有其他黨派(包括中國共產黨)的企望。。正因為如此，所以自毛澤東以來的共產黨人均奉孫中山為『革命的先行者』。這裡需要一個腳註，即當初的『驅逐韃虜』，雖然在狹義上是指推翻滿人專政，但在廣義上，也可說矛頭是指向(西方與日本)帝國主義。在這個意義上，由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與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是有先後共鳴之效的。但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民族主義之右翼，與毛澤東所代表的革命民族主義之左翼，僅在反帝國主義一點上相同。而在對中國社會、傳統文化與固有道德上，

有天壤之別。知道這點，才能更深一層體會到今日大陸與台灣間基本問題之癥節何在。

第二，自漢朝以來，由於科舉制度開科取士的關係，政府等於絕對掌握了社會昇遷的管道，所以掌握了知識份子的向心力與忠誠。而知識份子又絕大多數來自地主家庭。所以，朝廷的統治階層與知識份子（士大夫）和地主階級（即傳統農業社會掌控經濟的最重要階級），是絕對站在同一陣線。這也是為甚麼帝王朝代時期持續了兩千多年的道理（儘管有改朝換代，但同樣的帝制世世相承兩千多年）。可是，辛亥革命，卻開了知識份子與政府統治階層對抗的先河。民國以後，由五四運動以至國共內戰時學生的『反飢餓』『反戰爭』對（國民黨）政府示威遊行等等，甚至1989 天安門事件，學生大規模集結示威反對（共產黨）政府，均是延續了始自辛亥革命以來的知識份子反政府的（新）潮流。

第三，中國數千年的政治史，直到辛亥革命以前，可說相較之下僅有『文化主義』，而無民族主義。譬如儘管蒙古人與滿人在入關之前均是異族，但在他們先後控制了中國版圖而建立了元朝（1260-1368）與清朝（1644-1911）以後，之所以被中國人接受的道理，就是因為他們入關後全盤接受中華文化。故曰文化主義，而無民族主義也。元清二朝，雖然間或有少數漢人反抗之雜音，但全中國絕大多數的人民（包括漢人的多數）均因此而悄然接受這當初本是外來異族的統治與其合法性；並沒有因為他們是異族而不接受他們的統治。這兩朝之間，以清朝歷屆皇帝更深入地納入並積極發揚中華文化（譬如編撰『康熙字典』；整理四庫全書等）。也因如此，清朝比元朝維持要長159 年之多。這正代表了中國人『文化主義』的表現。可是，辛亥革命是在『驅逐韃虜』號召之下執行，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以『民族主義』領先。所以可說辛亥革命改變了這一切。民族主義，從此替代了以前的『文化主義』。

我們知道在世界上，無論在西方、日本，或更近代的反殖民的『民族主義』，均有一共同點。即『民族主義』象徵了確保國家獨立、鞏固主權、維護領土完整、再加建立鞏固的政權為當務之急（the dictate of state building）。但，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中國）和『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二戰後掙脫殖民桎梏而獲獨立的新興國家），與歐洲及日本的民族主義在另一方面有很重要的差異。即對前二者而言，它們的當務之急，不在擴張既有之領土或發動侵略戰爭。在歐洲相同的時間（即在脫離了中古世紀教會之支配與帝國陰影而孕出現代獨立『民族國家』的時代），也曾出現『國家至上』的絕對強權政府（state absolutism）。有人研究過，發現英國在民主到來以前的王權時代，它的國王權柄比中國任何朝代皇帝的權力，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明治維新的日本，也同樣出現了絕對強勢的政府。但是，在歐洲與日本，民族主義除了帶來過渡的強權政府以外，還帶來了向外侵略的帝國主義劣績。知道了此點，就知道中國在它的民族主義到臨之後所經過的強勢政權建造的過程，在世界史上並不是『獨此一家、別無分號』的。但中國的民族主義，因為它帶有濃厚的反帝國主義色彩，所以不會導致變為帝國主義侵略他人的詛咒。這和歷史上的歐洲與日本完全不一樣，而和前殖民地的『反殖民式民族主義』有相當共同點。這也是辛亥革命百年後，我們應吸受到的歷史啟示。更是我們應該讓西方（與日本）也同樣正視的不可忽略的歷史教材。他們若認識到這一點，就會正確判斷中國今日的興起會不會造成對他人的威脅。

結束語

除了以上所說孫中山與毛澤東各自代表的民族主義有共同點（即反帝國主義）以外，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以及他的復興中華的方案（見諸他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遙遙呼應了鄧小平所設計的『改革開放』振興中國的策略。鄧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孫的民生主義，正是異曲同工。前者是以國家領導經濟為主，輔以市場經濟。而孫中山的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用意幾乎同出一轍。孫中山援用禮記大同篇的『大同』思想。與今日北京倡導的『和諧社會』，亦不僅異途同歸而已也。孫中山遺囑中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雖然有其時代的背景，但如是換成今日世界上濟弱扶貧政策，也和北京當前對外（譬如在非洲與拉美）的作為雷同。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後，中國能和平崛起復興，坐二望一，又能謹守中山先生『國強不霸』的精神。中山先生在天之靈，應該欣慰。但，中山先生曾明確指示：『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國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這似乎正是對今日台灣同胞而言的。希望我們，無論是在海外的華人，或是在國內（包括台灣）的華人，僅記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訓，為中國的最後完全統一，做出不懈的貢獻。這才是我們在百年後紀念辛亥革命應有的認識。

本文係為應邀參加『修斯敦中國和平促進會』與當地僑社主辦的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論壇(2011/5/28) 的演講稿，發表于《中國評論》2011年六月號

志于留学，海外风华

志留紀

中华民国是什么？

写给辛亥百年

震旦子

编者按：震旦子试图展现的不仅仅是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政权的历史，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历史。对于今天的大陆学生来说，中华民国是什么，为什么中华民国会成为一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片空白。中华民国最重要的，不是它的主权所及、它的政权符号，而是它的内在价值。另，本文作者震旦子曾在台湾生活半年，对于台湾政情人情，自有别样体悟。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对于钦定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人逢五逢十都会有若干活动，逢百更是难得一遇，自当好好纪念一番。大陆搞辛亥百年，台湾搞民国百年，一“辛亥”各“表”，隔空喊话，统战与反统战，各居正统，倒也喧嚣热闹。今年的十月十日，两岸执政党领袖必会登台演讲，“各怀鬼胎”的慷慨激昂一番，两岸学者也会穿梭于种种研讨会之中，发表种种宏论崇议。煞是期待。

伴随辛亥百年到来，所有对人文社会科学感兴趣的人似乎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与辛亥相关的历史议题和人物，比如晚清新政、比如保路运动、比如革命与启蒙、比如和戎外交、比如孙文和袁世凯，成为专家学者和山寨网民激烈讨论的话题。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时下国人关注的焦点话题，比如中国改革前景、比如公民意识、比如言论空间、比如统独、比如民族（爱国）主义与对外关系，也都纷纷“托古改制”，披着“辛亥”的外衣在舆论和媒体中隐形呈现，不至于直接挑动官府的神经。借古讽今固然是一种自发的无奈之举，然而仅仅是“讽今”似不足以充分发挥“借古”的价值。辛亥对于今天的意义，并不在于借辛亥而指摘当局，甚至为指摘当局而刻意扭曲历史人物和事件；而是在于真的去寻求辛亥与当下的气若游丝、影影绰绰的历史连结，使人们恍然大悟：原来辛亥不仅在昨日，也在今日，甚至也在明日。那么，辛亥与当下的历史连结点到底在何处呢？四个字：中华民国。本文以下将揭示：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国，就搞清楚了 1911 和 2011 为什么那么接近、又那么遥远。

那么，中华民国是什么呢？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绝大部分大陆人认为那是一个并不算遥远的朝代，自 1949 年以后即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对于台湾泛蓝人士来说，中华民国自 1911 年以来从未被消灭，1949 年以后顽强的存在于台澎金马；泛绿人士则认为中华民国是外来蒋氏政权的代名词，台湾就是台湾，不是中华民国。这种对于中华民国定义的纠结，并不是朝夕之间形成，背后隐约透露出在两岸大历史框架中国际、国族和族群三个层面的互相角力。一中各表依然还是一个模糊的不能再模糊的议题，如果加上一“中华民国”各表，那么恐怕真是一团稀泥。

那么，我们就从历史的原点来考察中华民国吧。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打出了湖北军政府，随

后打出了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湖北人，站在今日的武昌阅马场、首义路一带，不禁有些许感慨：政权的更迭，可能就是一发子弹、一个口号的事情。在国共两党的历史教科书中，武昌起义都被记在孙文头上，并成为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革命谱系的光辉顶点。作为党化教育下的芸芸众生，国人已经惯于沉浸在执政党和前执政党的丰功伟绩之中。脑后反骨的李敖在白色恐怖时代的省立台中图书馆中翻出一本被国民党查禁的革命大老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方知国父的牛皮之下，尚有日知会、共进会之流的努力；此书 1930 年出版之后即被汪精卫和胡汉民联手查封，罪名即是“记载失实，讥评总理”。说来也巧，这个曹亚伯，正是我的同乡，虽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却不见容于孙文的徒子徒孙；被查禁的《武昌革命真史》一书，也直到 1982 年才由上海书店重新出版，然而斯人已去，武昌革命的伪史，也早已登堂入室，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华民国的起点，并不是国民党一家一姓的“青天白日”，而是融革命党、绅士和黑社会于一炉的“十八星”。所以，中华民国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那就是重复一百遍的谎言，也决不会变成事实。中华民国不是国民党圣君贤相的专利，它的诞生，属于那个夜晚在武昌军营仰望星空的人，包括金兆龙、熊炳坤，也包括黎元洪，更包括曹亚伯。

1912 年元旦以后中华民国进入五色旗阶段。南北议和，清帝逊位，溥仪尊孙文为“亲爸爸”，君主体面下台，既未如 1949 年般追究“内战责任”，也未如 1957 年般进行“反攻倒算”，排满革命的中华民国一转而继承清朝国际法人地位，与凯末尔革命后将土耳其与奥斯曼剥离的干干净净大相径庭，堪称政治宽容的典范。政党政治、强人政治和魅力政治，到底敌不过武化政治，然而军阀之间的春秋无义战，总还要比国共之间的战国总体战来的温文尔雅一些。在各色头面频频登场的动荡年代，辛亥遗留下来的平民造反精神，蜕化为大小军头的尔虞我诈，老革命党的种种理想主义，也在混战中消沉、堕落。五色旗时代的国会、法统和法统重光，似乎在延续辛亥肇造的中华民国国祚，却也不过是一块遮羞布，分属于种种派系的总统、总理和执政便在此之下像玩弄妓女一样玩弄政治。近来出现种种为北京时代的中华民国“辟谣”的声音，譬如产生了思想自由的北大、譬如有相对宽松的言论尺度、譬如军阀混战尚有基本道义，譬如某些军阀领袖的风骨操守，等等。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似乎意味着昔日北京较诸今日北京更形“理想”，反政府的陈独秀、邵飘萍，在很长时间内安然无恙、怡然自得，令人艳羡。然而，对于小老百姓来说，乱离人不及太平犬。坐稳了奴隶的人们，忽然命丧于无端的炮火之中，然后死难者的亲属，还要强装笑颜迎接大帅进城，如果这也算“民国”的话，绝大多数的小老百姓宁可活在非民之国，毕竟他们毫不在乎什么民国帝国、公民臣民，坐得稳的大清比坐不稳的民国强多啦！所以，中华民国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那就是没有生命的自由跟没有自由的生命一样可怕，所以无政府并不优于专制，个人的风骨掩盖不了集体的罪恶。

1928 年的北伐统一，中华民国开启青天白日满地红时代。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国民党终于挺直了腰杆，开始不遗余力的教训中华民国国民，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与一个主义登堂入室。然而国民党的党治，终归是天公不作美，执政二十二年间内忧外患未曾消停，让国父的好学生蒋委员长焦头烂额，即便是“一个政党”里面也是打打杀杀、互除党籍，哪里顾得上教训国民。于是我们的中华民国，便在血雨腥风之中、颠沛流离之中、党化与造反之中、训政与行宪之中，步履蹒跚、一波三折，忽而近乎亡国，忽而跻身四强，忽而醉生梦死，忽而阶下之囚，命运的变幻，岁月的侵蚀，使得执政者也罢、反对党也罢、老百姓也罢，疲于应付种种事变、事件和运动，而完全忽视了民国精神的成长，使得四亿民国国民，除接受神话般的党化教育

之外，实在感受不到民国与帝制的区别。即便是民族主义鼎盛时期的抗日岁月，左一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右一个中华民国南京政府，让自居正统的中华民国重庆政府大为尴尬，三个中华民国，蔚为壮观。在中华民国最大一次生存危机度过后，1946 年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召开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张君劢起草、雷震修改、胡适亲自将宪法交付蒋中正，但行之不及一年，即遭《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而有趣的是，申请冻结宪法的与制定修改宪法的正是同一批人。之后就是空前——我希望也是绝后——的国共大战，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所积累的一切善与恶，在这场大战中被打的灰飞烟灭。龙应台笔下的长春攻防战，惨绝人寰、天地同哭，胜利的人们，踩着被时代蹂躏和践踏的人们的遗体，一步一个脚印，为中华民国这个在之后的岁月中长期被视为罪恶的代名词唱响挽歌。青天白日旗终究在长春、在南京、在重庆、在海南岛、在大陈岛一次次落下，飘进了海里。所以，中华民国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那就是训政绝对训不出合格的民国国民，只会训出党机器和建立在党机器之上的战争机器。

三十八年后，中华民国在它所诞生的地方确实已经被抹去了，这被视为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端。旧时代的遗老遗少们，据说裹着足量的黄金和文物，乘着海浪和风雨，坐着并不太平的太平号，在二二八事件两年多以后到达台湾，宣称中华民国在这里继续存在。对于这场中华民国大迁徙，浸满了血泪的《大江大海》和充斥着揶揄的《大江大海骗了你》都为我们展示出南渡朝廷的凄凉。所谓的蒋家王朝，实际上从 1949 年才开始，我们的蒋总统，在摆脱蒋总司令、蒋委员长之类不过瘾的称呼后，终于把台湾的中华民国，做成了蒋家的天下，然而这个天下，和“少康中兴”“勿忘在莒”这类图腾所昭示的天下，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当反攻的幻想随着民国年号的递进逐渐幻灭之际，当年制宪国大的要角雷震首倡“中华台湾民主国”，居然要在台湾革掉中华民国的命，令老蒋震怒，雷震的后半生，身陷囹圄。从来不自认为是台独的雷震，却在海外被奉为台独的先师，而且将台独与民主的捆绑，较诸本土台湾人廖文毅兄弟的血统台独论，确实高明许多。当蒋记中华民国在七十年代经历残酷的逐出联大、对日断交，我们的老蒋总统，固然可以继续强作镇定的装作“庄敬自强”，然而穷途末路、美人迟暮的沧桑之感，却也见证了雷震的先见之明。故而蒋经国的“我也是台湾人”的表态，成为重奠中华民国-台湾的基石。左手边是共产党的一国两制，右手边是岛内本土化风潮，我们的小蒋总统试图唯履中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于是果断的选择了后者。当蒋经国 1988 年辞世之际，我想他已经完全设想好了蒋家王朝和中华民国的出路：蒋家王朝注定随着他的死去而死去，而中华民国却随着他的死去而再生；蒋家王朝没有出路，中华民国的出路就是台湾。蒋经国的去世，实际上宣告 1949 年到 1988 年浮漂沧海、孤魂野鬼四十年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终于真的走进了坟墓，在这四十年间，台湾在中华民国的名义下，历经白色恐怖、经济腾飞、党外运动、外交动荡、政治改革，走出了一条与中国大陆截然不同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雷震囚禁以死、胡适慷慨以死、孙运璇遗憾以死、郑南榕自焚以死。中国大陆的旁观者们，不要以为这一段历史跟你漠不相关，拨开台独史观的迷雾，你会发现以上列出的在中华民国神话时代的主要演员，居然全是大陆人，或者用他们的新名字——外省人。他们的出走，他们的认同，他们的纠结，都和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共和国息息相关。所以，中华民国给我们的第四个启示，就是神话终究敌不过现实，一个政府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必须拼政绩、拼成果、拼毅力。以中华民国名义而存活四十年的台湾，正是一批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们的不懈努力，才缩小了神话和现实的差距，让风雨飘扬的蒋家王朝，终归

和平转型。

李登辉的崛起最终埋葬了神话时代的中华民国，党外运动发展成民进党，海外台独人士纷纷回岛，中华民国开始逐渐与秋海棠脱钩，而与美丽岛结成想象共同体。随着两岸政治气候的松动和双向交流的开展，中华民国——或者说中华民国台湾——开始重新回到中国大陆的视野之中。第一批开放探亲，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四十年再重返中国大陆的老人们，在荒芜的父母的坟茔前痛哭流涕，那种感觉，比“乡音无改鬓毛衰”更为悲凉，因为故乡已经彻底的随着历史的巨轮消失了。这批满怀希望而来，而又满怀失望而归的人们，重新回到了台湾，他们也永远的成为了台湾人。九十年代中期的李登辉将这种台湾人意识发挥到极致：1994年接受司马辽太郎访问，第一次向全台大谈台湾人的悲哀和外来政权的罪孽；1995年在母校康奈尔，第一次向美国公开大谈中华民国在台湾；1996年在首次总统直选中击败彭明敏，第一次向全世界大喊：“民主的大门，终于在台澎金马地区完全打开了。”李登辉确实是划时代的人物，从他以后，任何人想要成为这片土地的执政者，赢得这片土地上人民的信任，所打出的最主要的招牌，不再是“我爱中华民国”，而是“我爱台湾”。“我是台湾人”成了这片土地上最高尚的口号，本省人的阿扁要借此炒作，外省人的小马哥要屡表忠心，旧移民似乎扬眉吐气、挺直腰板，新移民始则战战兢兢、终则虔心皈依。两千三百万——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主动还是被动——在台湾的名义下被团结、被感动，中华民国渐渐成了台湾的附属品，消失在人们的话语和记忆中。所以，中华民国给我们的第五个启示，就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和政治符号，必须融入低低在下的土地和人民。

如果仔细观察1949年以后两岸的政治发展，便可以看出，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我们的中国大陆，在本质上跟对岸走过的是同一条道路。当台湾在创造中华民国的神话之际，大陆正在创造共产主义的神话，两岸的领袖都曾受到亿万斯民的真心吹捧，放佛领袖的意志便真的会将神话变成现实，民众的梦想将恐怖和革命塑造成狂欢的节日。当雷震戳穿领袖的神话牢底坐穿之际，比他更倒霉的张志新惨遭割喉；当柏杨因着《大力水手》漫画莫名其妙的触怒当局时，北京更是出演所谓小说《刘志丹》反党案以及批林批孔时期的评水浒。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之在两岸均受到批判：在大陆，胡适高足罗尔纲被迫投入批判恩师，声泪俱下，一刀两断，在台湾，军方因《自由中国》事件大为光火，在军内





报纸上公开批判胡适，胡本人也在中研院讲话中因谈到“言论自由”一时激动，心脏病发而歿。在中华民国融入台湾的土地时，社会主义也融入大陆的土地，中国本土式的经济运行方式、政治运作理念和思想意识形态全面复活，《人民日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黑体字语录以及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意象则是龙的传人和炎黄子孙。所以，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实在是一个比民国还民国的民国，两岸的政治，都是从神话到现实，从云端到土地，从强人到平民。

所以，这篇文章所指称的中华民国，不是在指称一个国际法主体、不是在指称一个政权、甚至不是在指称一个国号，而是在指称一种意识形态。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曾经让 1911 年的革命党血溅武汉三镇，让 1921 年的新革命党聚义嘉兴南湖，让 1931 年的九一八成为全民之耻，让 1941 年的飞虎队纵横莽莽长空，让 1951 年的蒋中正启动国光计划，让 1961 年的周恩来制定一纲四目，让 1971 年的周书楷挥别联大会场，让 1981 年的纪政奋战国际奥委，让 1991 年的沈君山建言国统纲领，让 2001 年的陈水扁高喊一边一国，让 2011 年的马英九、蔡英文和王毅隔海辩论九二共识。被中华民国这个意识形态所激励的人中，有革命党、反革命，有大陆人、台湾人，有中国人、外国人，有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无党派，有统派、台独、不统不独，这些在政治光谱上高度对立的人们，居然共享着同样一种被归纳为中华民国的意识形态。这种形态的第一层含义，就是民族整体的自由，统独的分歧在于民族的边界在哪里，而不在于民族是否应当自立；第二层含义就是民众个体的自由，革命党和反革命的分歧在于民众的边界是哪里，而不在于民众权利是否应当捍卫。1911 年，武昌城内的革命党的诉求无非是排满与民主；2011 年，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最大多数黎民们，所孜孜以求与翘首期盼的，也无非是“大家”的不被侵蚀与“小家”的不被冒犯，这与排满和民主，实在是同一码事。

所以，无论是一百年前，还是一百年后，我们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的人民所一直不断追求的，就是民族和民主。我们可以批评民族主义的虚骄自大，可以批评民主政治的效率低下，但无法批评民族和民主对于中国人的激励和鞭策。以民族的面向来看，辛亥以后的一百年间，中国的整体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上有核弹头、下有核潜艇，民族自存自立毫无问题，然而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对于中华民族认同饱受争议，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不再是如何防止“他者”进犯“我者”，而是如何确保“多数”善待“少数”；以民主的面向来看，辛亥以后的一百年间，两岸都纷纷走入歧途，大陆由军阀割据而党化训政，台湾由殖民武断而蒋家王朝，党治天下、领袖崇拜和政治神话让全民恐惧且癫狂。然而，大陆的经济改革、台湾的地方选举，终究为

民众的参与和权利另辟蹊径，使得 1980 年代后的两岸在增进人民自由与福利上，均取得长足进展，不必担忧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的狂风巨浪。时至今日，大陆依然在探索合适的民主形式，台湾也在政党轮替中完善民主实践。当然，大陆内部、两岸之间、中西之间对于民主是什么、民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民主在何种情形下适合中国以及中国所追求的民主是不是就是原汁原味的 democracy 等诸多议题尚存较大争议，但最起码的一点是，民主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最热门的讨论问题之一，这点空间也是一百年来不断打拼的结果。

所以，回到本文的开头，在辛亥百年的今天，我们根本不必陷入政治家的话语圈套、去纠结中华民国的政治含义。从更深刻的政治内涵来看，中华民国就是全体中国人对于民族自立和民主政治的追求，所以中华民国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更在未来，所以谈论中华民国，根本不是在谈统独、谈国共、谈两岸，而是在谈价值、谈理想、谈追求。所以，我根本不屑于借古讽今、借台讽陆，因为真正的最有意义的中华民国，不在于辛亥的史海钩沉、不在于台湾的政治符号，而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中华民国的意义，根本不会随着十八星旗、五色旗、青天白日旗和五星红旗的改朝换代而黯然失色。我们足下的土地，不管它的实际疆域有多广，也不管它的国号换了多少次，它的本体和内核，永远只是四个字：中华民国。

谨以此文献给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百年以来，在中国大陆、台湾和海外，为了这片土地上的整体自由和个体自由的所有活着的和逝去的，特别是因此而殒身不恤或受尽凌辱的人们，也献给所有未来执着于这份理想的新新青年，政治是一时的，而超越政治的你们注定会因此而不朽。

共和的理想——听《卿云歌》

黄陀

编者按：本文作者就读于耶鲁大学法学院。该文以民国初年的《卿云歌》楔子，阐发国歌与国家精神之关联。共和理想，不但在政治，更在艺术。

为什么国歌非要是打打杀杀号角冲天的军乐？以军乐出名的国歌，最著名的要数《马赛曲》，原名《莱茵军战歌》，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最后两句是“用（侵略者）的污血 浇灌我们的田”。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法国的政治也是充满了游行示威暴力的街头政治。其次要数《国际歌》，曾被苏联用作国歌，后来斯大林时代苏联国歌改为《牢不可破的聯盟》，是一首有歌颂斯大林个人内容的军乐；再后来，这首斯大林的军乐又被强人普京拾了起来，重新填词后成为现行的俄国国歌。

然而中华民国初年的《卿云歌》就不是这样的国歌。民初音乐家萧友梅作曲，歌词为：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词出自《尚书·虞夏传》，相传为舜让位于禹时所唱，唱毕感叹：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卿云烂兮”即灿烂的彩云，喻五色国旗五族共和；“光华”亦指光复中华。曲调庄严祥和，如初升之旭日，比后来的若干首国歌好不知道哪儿去了。

卿 云 歌

1 = G $\frac{4}{4}$

庄严宏伟 让·欧士东

f

1 5 3 . 2 1 | 2 6 4 . 3 2 | 7 2 3 4 6 5 . 3 |
卿云烂 兮，卿云烂 兮，卿云烂 兮，糺

p cresc.

1 . 3 3 2 1 5 5 | 6 7 . 1 2 2 | 7 1 . 2 3 7 |
缦 缓 兮，日 月光 华，旦 复旦 兮，日

f

1 2 . 3 4 4 | 2 3 4 5 1 | 2 . 1 2 4 4 |
月光 华，旦 复旦 兮，时 哉 夫，天 下

rall.

3 1 8 1 3 | 2 - 2 - | 1 - 0 0 ||
非 一 人 之 天 下 也。

这些抒情的曲调，自然是不受革命小将们待见的。几十年来军事化的社会，已经把“尚武”的精神、“革命”的“血性”深深烙在每个人的心里，于是无论持什么政治观点的人，听到雄赳赳气昂昂的军乐、看到整齐的军装和正步，多少会有些共鸣、甚至被感染，无论是否赞同政府的统治。

然而一个崇拜军队的文化，始终是病态的。军国主义的狂热最终让日本自己满目疮痍，军火商头目切尼的新保守主义也让美国树立了许多不必要的敌人。在平民的社会中鼓吹一种斗争哲学，不是统治者转移矛盾的伎俩，便是野心家谋取私利的旗号；而试图在平民身上激发出一种军人的斗志，干脆就是鱼肉人民了。军魂只应该呆在军营里，平民不需要军魂。一个机会没有被少数人——一个行业、一群世袭贵族或是一个地区——垄断的社会，平民自然会充满活力。陈丹青说他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大吃一惊，因为他看到街上的年轻男女，人人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一个俄克拉荷马市立大学的毕业生会觉得哈佛的同辈有什么了不起，试图炫耀自己文凭名校毕业生们只会招来背地里的嘲笑。常春藤三巨头学校中潜藏着众多美国贵族的子嗣，然而他们却总得小心翼翼、生怕自己显得与众不同。

美国的政治生态也是如此。联邦制度保证了默默无闻的小州也能活得扬眉吐气，比如特拉华。联邦制度下允许各州制定不同的公司法，特拉华州优秀的公司法体系脱颖而出，以致美国百分之五十的上市公司、《财富》五百强的企业中的三百家都是在特拉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州注册成立的，由此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特拉华政府不无自豪地宣称，他们负责管理企业注册事务的州务卿办公室完全不像是官僚机构，而本身就像是一个做出了品牌的企业。更不用提纽约的金融，芝加哥的期货，硅谷的高新产业，中部的农业，以及分散在全美每个角落的世界顶尖大学和研究机构，让相比之下首都华盛顿显得毫无活力——专门建立的政治首都专司管制职能，为的是服务全国，而不是从全国集中资源。

共和制度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然而继续这种集中的、无制约的权力，则永远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从你死我活的倾轧中解脱出来，听得懂那首曲调悠扬、言简意赅的《卿云歌》呢？

所以，共和的理想，不是要去打倒谁，不是要去践踏谁，而是要给每个人一点机会。如果不是数倍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政府增收，会出现政府官僚机构的无限膨胀、会出现考公务员一考考七年的骨灰级考生么？如果不是官僚资本和国有垄断企业用行政地位为少数人从社会榨取福利，私营中小企业会举步维艰么？如果不是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首都、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天子脚下，会有那么多人打破头要挤进北京、使这座古城不堪重负么？……

大陆神州，华人之根

陆 根 纪

辛亥一

四川的历史坐标

岷渝

编者按：世人皆知武昌的中华民国，而鲜有了解荣县的中华民国。岷渝的文章，糅合着乡情与国情，交叉着历史与现实。我们必须相信时间，因为除了时间，我们还可以相信什么？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是四川省最高的纪念碑。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这座纪念碑被川汉铁路公司树立在成都市中心的少城公园，为了铭记两年前成都四川总督府前的喋血，也为了铭记那一段光荣的斗争岁月。

其时，革命之后的动荡已然开始显露端倪，从武汉到成都的川汉铁路修建几乎停滞，直至路基最终废圮。2010年年底，宜昌到万州的铁路贯通，川鄂交界的山区终于响起了汽笛声，大山里的许多老人，是今生第一次看到火车。

一百年前，“铁路国有”的风暴催生了革命。然而这条铁路的贯通，竟让川鄂边的乡民再等了一百年。以现代化的尺度回望辛亥，川汉铁路是个引子。

庙堂与江湖之间

1911年6月，清政府对四川铁路建设的苛刻政策让这个西南内陆省份的民怨被骤然点燃。

“铁路国有”一案的推动，清政府是依各地筑路的成绩区别对待。铁路造得好的江浙，政府比较客气，对两湖则次之，对四川的态度最为严苛。川汉铁路公司早前在上海的钱庄存得款项，本来要“以财生财”，最后却遭遇巨额亏损，川省坊间希望清政府能在出够铁路公司欠下的开工款之后再弥补上这笔亏空，就接受其开出的国有化条件，而执政者却不仅不出一分钱，还要再清查铁路开工以来的每笔建设经费。

川汉铁路公司名为“商办”，实则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甚至不乏地方官员要求县民认购的。如此一来，川汉铁路也就与川省多数民众都搭上了关系，清政府要“国有化”，自然刺激全川最敏感的神经。说来民间力量筑路不力，政府对“铁路干线”实行国有，本身不无道理，然而晚清当局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错误的手段采取行动，为自己敲响了王朝丧钟。

清末新政说来还算搞得有模有样，晚清的世道和经济，丝毫不比民国战乱的时代糟糕。知道

君主立宪可保万世一系，就连慈禧太后对新政也并非是叶公好龙。执政者和民间社会的关系，在1911年骤然紧张。皇族内阁，打碎了旗汉之间的和谐，激起汉人对于其政治权力遭遇削弱的强烈不满。而铁路国有化，则是“国进民退”浪潮的标志，一边建皇族内阁把政权揽入满人之手，一边搞铁路国有让民间经济力量萎缩，这时候的汉人，怎能不相信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从跪着造反到武装暴动

自“铁路国有”政策一出，全川各界都向四川省和朝廷请愿，据理力争。甚至连代理川督的王人文屁股也坐在川人一边，希望当局改变苛刻政策。

1911年6月，成都的街头到处搭起光绪皇帝的“皇台”，上书光绪“铁路准归商办”的上谕，保路同志会渐次将运动推向高潮。此时的四川保路运动，实际上是主张立宪的改良派主导，搭起“皇台”，跪着造反的斗争方式，对中国后来数十年的政治表达运动都有影响。

然而和平请愿，却没有换来清廷的丝毫让步。9月7日，新上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抓捕保路同志会的正副会长蒲殿俊、罗纶，还开枪射杀了总督府前要求释放他们的请愿者。而同一天，保路同志军开始武装起事了。

9月间，全川各路保路军向成都进发，但遭到清军抵抗，几度受挫。9月25日，自川南荣县开往成都的义军失利折返，同盟会员吴玉章宣布“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廷统治的县。

武昌起义后打出“中华民国”国号，因而成为民国国庆，但该起义由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与同盟会没有直接关系也是事实。保路烽火与之不同，同盟会介入极深，保路同志军领导人多是同盟会员，因而孙中山肯定“荣县独立”首义实先天下。

当温和被当成激进的时候，温和难以避免地走向真正的激进。曾经为立宪派主导的官民合作路径走到尽头，革命的发生就势在必然。

殉难的改革者

读到辛亥历史，最让我唏嘘的还是端方和良弼。

端方，是人中翘楚，其思想之开明，在旗人中几无出其右者。他在直隶、江南、两湖等地担任督抚，搞新政都搞得有声有色。他倡导“消除满汉畛域”，上书力陈改革，是君主立宪和满汉融合积极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然而，他却最后惨死在革命党人的刀下。

四川保路军起兵，一度赋闲的端方被重新起用，率兵入川弹压。然而他并不是要霸王硬上弓

的一介武夫，反而寄望以温和方式化解纷乱的战局。他没有直接前往成都，而是在成都东南的资州坐镇观望，不仅放出话来要释放所有被捕者，甚至还参劾了镇压保路的川督赵尔丰。

武昌新军起义之后，端方带来的新军开始骚动，端方的头颅在四川资州被割下，成为革命者的投名状。

良弼出身宗室，系努尔哈赤幼弟之后裔。满清末世，作为宗室旁支的良弼并无太高地位，反而处处受压制，但是他对于大清朝还是忠心耿耿。辛亥年底全国各地形势已经急转直下，良弼还组织宗社党，一心保皇。

其实，良弼是君主立宪的拥趸，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延续清朝国祚的唯一一途。在满人中，他和端方一样是个开明派，他甚至对戊戌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极尽推崇。

1912年1月，良弼被彭家珍炸成重伤，不久死去。大清最后的忠臣一死，袁世凯的逼宫大业既成。

成都人

良弼是在成都长大的。他早年丧父，作为飘零在外省的孤儿，他身世浮沉。

彭家珍也是成都府人，他的家乡在成都府东部山区丘陵的金堂县。

良弼死前曾说：“我辈军人，死何足惜看，吾见政府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今我死，清室亦亡，刺我者真知我者也。”彭家珍在绝命书中说：“反对共和者，极其阴狠者为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这两个同在川西长大的人，果然是知音。

良弼死后第二年，保路死事纪念碑在成都少城建立起来。“少城”实际上是清代成都的满城，即旗人居住区，在旧日的满城建起这座碑也有了别样的意味。良弼小时候大概也常常穿梭在成都满城的胡同，他或许也操着一口带有四川口音的官话，策动荣县独立的吴玉章和他一样曾是留日学生，而亲手将他炸成重伤的彭家珍也是他的半个老乡。

一百年后，位于满城的宽窄巷子以成都古街巷的名义被进行旅游开发，成了成都灯红酒绿的所在。店铺里到处贩售具有川西风味的饰品，院落里每夜传出温婉的笙歌，食客们在饭店里品味着辣椒和豆瓣合奏的味道交响曲。

谁还记得，一百多年前，曾在这些巷陌里走过的满人宗室良弼？

相信时间

就在纪念荣县独立一百周年的时候，北方强邻俄罗斯的总理普京，确定竞选下一届总统。他

计划开始自己的第三个总统任期，进入自己执政的第十三年。“新沙皇”已经呼之欲出。

十几年里，俄罗斯新闻界辛苦遭逢，已有超过两位数的记者因为批评普京政权而被暗杀。曾向统一俄罗斯党发起挑战的前总理卡西亚诺夫参选总统，却被选举委员会指为“不合规定”而被取消竞选资格。甚至，这个联邦制国家还修改宪法，取消了地方政府首长的直接选举改由总统直接任命，用强力中央集权取代了原来的地方自治。

这是 1905 年革命之后的一百年，这是苏联解体之后的十几年。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依旧步履蹒跚。而在荣县所在的四川和中国，一百年前的革命所追求的民权，更远未实现。在中国，就连形式上的选举民主都还没有确立。辛亥年的震荡，成功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然而民主自由的共和梦想，却依然是中国大陆最深的期盼和渴望。

辛亥年四川起事，袍哥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之后革命中民间社会的消弭使执政者拥有了空前的全能力量，也彻底破除了反政府力量地下形成力量的土壤。与共和制度相适应的民间社会，需要在法治基础上重新建构，而公民力量的兴起，也必然在政治和经济上提出新要求。

革命可以打碎一个旧世界，却不够建立一个新世界。对于中国和俄罗斯这样有着深厚专制传统的国家尤然。回望辛亥年汉人斗争的起点，在于分享政治和经济权力，获得个体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以权利对抗权力，是专制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不变主题。而实现这一进程的过程，注定需要民间社会有更强大的力量，同时适应现代社会的组织。

这注定是一个多方博弈与妥协的过程，惟其如此，才能确定对于各阶层而言都相对稳定的秩序。社会变革之花，只有在这样的土壤下才会结出繁荣之果。

所以在辛亥百年之际，中国人依然要相信时间。

我相信，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成败得失应由公正的尺度来衡量，而时间，就是最公正的尺度。

半是龙种，半是跳蚤— 我眼中的辛亥革命纪念

木易青

编者按：本文是对辛亥百年思考的思考。辛亥百年不应该成为一场热闹，而是应该有所沉淀。？

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海涅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三场革命大概是要值得纪念的，第一场是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史家一般的论点是推翻帝制，造共和；第二场则是 1949 年的共产革命，建立起来的是今天调侃曰“天朝”的新利维坦；第三场就是 1966 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是被叫做“灵魂深处闹革命”。按理说，离我们最近的那几场革命，应该是对我们影响最深的，我们要纪念和仔细研究的应该是那几场革命。可是，当朝人不写本朝史（其实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所以，对那两场革命我们要么是视而不见，就当它压根没发生过一样，要么就是对着泥菩萨烧香，表面上做的和心里面想的完全不一样。于是，第一场革命的重要性就顺理成章的“越来越重要了”，加上是逢整数，还孱和进了两岸的政党斗争，这借他人之酒浇心中之块垒的庆典也就变得愈加热闹了。正如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国内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论述已经够多的了，看一看今年开春以来出了多少本有关此方面的书，又办了多少场讲座就明白了。光单行本的书就出了七八十本，马勇、杨天石、傅国涌、李刚、袁伟时、雷颐、萧功秦、金满楼、王树增、祝勇、雪珥、杨奎松等等国内学者纷纷登场不一而足，以至于秦晖不得不说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是“演员越来越清楚，而剧本是越来越模糊”。对于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我们的确是倾注了不少“关注”。但是，这真的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知识有所增长了吗？相对于教科书上早已陈腐的宏大叙事宣传，“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随便翻一翻学者们的文章，张鸣说清末立宪一直是主流，革命是杂音，袁伟时说每革命一次社会就要倒退二三十年（这还是对杨小凯的歪曲借用），而萧功秦说临时约法打开了后二三十年多灾多难的大门，好，辛亥革命的知识升级到了革命与改良抢时间的新版本，在这个版本里改良成了一个满是委屈的良家少妇，而革命则是莽撞粗暴的不良少年，最后不良少年强暴了委屈的良家少妇，生下了个营养不良的瘦弱婴儿。不过这个版本似乎并不比前面那个版本高级不了多少，且不说满是漏洞打满了补丁（比如立宪派已经有过的武装抗争史，比如立宪派实际是辛亥革命的主力，革命党没捞到多少实惠），其把复杂的历史简化为改良和革命的二元对立的做法就很值得商榷，我们都应该知道一场改变历史的事件必然有其复杂的起源和作为合力的各种因素，就好比苏联的

解体，单一的解释都是很难站住脚的。辛亥革命也是一样。这里，我倒赞成这样一种说法，即清政府已经耗尽了它所有可用的权威，在人们眼中，只要再做错一件事情，他的死期就到了，从这种意义上讲，所谓革命与改良的竞争完全是伪命题。

辛亥革命真正值得去研究的命题，不是转型的起因，而是转型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因为历史是没有办法假设的，与其假设清政府不倒台会带来什么，还不如看看民初十多年的问题，比如劳工、国际关系、农村、边疆地区变迁、市民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宪政的得失成败、政党政治等等（事实上，这些都是互相作用的）为什么民国的逻辑最终还是变成了“枪杆子里出政权”？为什么从上到下都对民国失望透顶？（不然也不会有接二连三乃至最高潮的共产革命）这或许对现实还有些启示。而大凡改变历史的一件事情，平民的历史则更为重要，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民国政治变乱中，普通民众的声音往往湮没无闻，但是事实上，辛亥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在现代化的条件下民众的逐渐觉醒，没有民众的逐渐觉醒辛亥后的种种大事件必不能成为可能，而甚至辛亥革命本身也不能成功，比如五四运动，比如共产运动的逐渐兴起。（当然，辛亥及民国的精英分子都有一种社会主义的情绪）。

朋友从台湾回来说，现在台湾学者认为现今的大陆颇有当年辛亥革命前夕的山雨欲来之势。我一笑，明白，人们明白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可又往往倾向于“太阳底下无新鲜之事。”喜欢用过往的经验来类比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好比热炒的辛亥革命。不满是的的确确的，但是历史会怎么走呢？也许答案就在年青人身上，正如某人说的“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我们既可以成为龙种，也可以决定做个跳蚤。

双十记忆— 一座城市的百年瞬间

文祥

编者按：武汉是钦定的辛亥革命源地。文祥对于 100 年来武汉辛亥的解读，颇有物是人非、斗转星移之感。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然而史迹的留存，也有类似“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的讥讽。一座城市的百年瞬间，凝结了多少欢喜悲愁？无论如何，武汉的辛亥，值得一品。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集大成者，也是文明记忆的重要创造者和载体。在漫长的文明史中，人类曾经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创造过无数个大大小小，面目各异的城市。从巴比伦、底比斯到雅典、罗马，再到长安和君士坦丁堡，这些城市之伟大，皆因其在漫长的时间里，持续为人类社会散发出灿烂优雅的文明之光。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些城市，它们或许同样拥有值得骄傲的历史积淀，可最让世人瞩目的往往是某一个瞬间的定格。在那一刻，城市强力撬动了人类文明的轨迹。1776年的费城、1789年的巴黎、1911年的武汉、1917年的圣彼得堡……当这些城市的名字镶嵌进这些数字之中时，它们的背后毫无疑问承载着在人类文明史上堪称光彩夺目的记忆瞬间。

武汉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座落在亚洲第一大河及其第一大支流的交汇处，独特的地理格局，似乎隐隐暗示着 这座城市必将在亚洲文明史上写下惊世之笔。她自近代以来异军突起，在几十年的岁月中厚积薄发，成为沉闷古旧的中华帝国中一颗耀眼的明星。而她随后更在1911年10月10日这一天，为民族乃至全人类奉上了其三千年城市史上的最大厚礼。从这里爆发的辛亥革命，彻底摧毁了东方世界最顽固的封建帝制，创造了亚洲首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巨变，毫无疑问在武汉的城市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也让每年的10月10日这一天对于这座城市而言，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从1912年开始，双十记忆成为了武汉城市记忆中令人难以忽略的篇章，而回望百年来的城市风云，百年双十也的确为后人留下了众多值得回味的瞬间。

武昌首义，是中华民国肇始的标志。而此后历经各省独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南北议和、清帝逊位、袁世凯就职大总统等事件，初生的中华民国在疾风骤雨中度过了最初半年的时光，直至1912年春暖花开之时方才初步安定下来。对于这个新生的亚洲第一共和国而言，确立国庆节似乎成为了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构建中的一项重大任务。对中国人来说，“国庆节”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是一个之前从未有过政治试验。围绕这一节日的确立，自然免不了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建议乃至争执。事实上，不仅是国庆节，一些人对于民国的纪年亦颇有微词。1912 年10月9日至10月13日，《大公报》连续四天连载了一篇名为《中华民国之元年开民国周年纪念会议》的稿件。这位作者在文中用辛辣乃至尖酸的词句，对以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民国元年，而将1911年革命后的近三个月时间排除在民国纪年之外的做法表达了不满：“……有民国以举之，而后有总统之被举，而后有总统之宣誓。元年者为民国而纪也，非为总统而纪也。民国之总统，其权由民国之众授之，非由甲总统授于乙总统，乙总统授于丙

总统。如使纪元不以民国而以总统，不以民国之肇始而以总统之宣誓，则不将授受之总统，不将一总统一纪元乎？”如果说，从民国纪年开始就隐藏着某种不合理因素的话，那么随着几个重大纪念日逐渐临近，国庆节的确定问题自然会引发更加尖锐的争论。在政府层面，最早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是在1912年7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在这次大会上，政府首先提出了设立国庆节的三个方案，即清廷下诏逊位日、袁世凯就大总统职日和南北议协定日。面对这样的方案，来自湖北的教育代表李廉方终于坐不住了。他当即提出抗议，认为这三个方案都不合适，并提出以武昌首义日为国庆。李说刚提出时，会场上“颇多反对”，特别是浙江代表邵章与之争执不下。今天我们可以确切知道李廉方当天陈词的具体细节了，但我们可以确知的是在那天的会场上，他用世界眼光分析这一问题，动情晓理地力陈其理由：美国的国庆节定为大陆会议在费城通过《独立宣言》的7月4日，法国的国庆节定为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的7月14日。中华民国“揖欧追美，旧邦新造”，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正是追随法美革命的步伐。我们的国庆节，当然也应该学习法、美，以首义为国庆而无他。在李廉方演说后，“全场态度为之一变，湖南、安徽、江苏代表尤力赞李说”，当表决他的提议时，“与会者四分之三举手通过”。随后在9月底的参议院会议上，以双十武昌首义日为中华民国国庆节的议案，也获得了通过。

可以说，这个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国庆节，是湖北革命党人据理力争后争取来的。“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山河普照”。国庆当日，首都北京自然举行了盛大的庆典，而千里之外的首义之地武汉，同样举办了规模不菲的纪念大会，“踵事增华，不亚首都”。前清皇殿改为“烈士祠”并被修葺一新，在祠内设立了纪念大会的主会场，入口和出口处悬挂的“幕开东瀛”、“政媲北美”的匾额十分醒目。烈士祠内，供奉有彭刘杨三烈士、湖南都督焦达峰等革命烈士的遗像，而会场内外，更悬满了众多对联。如黄兴撰联：“江汉汤汤，这似水流年，常记取八月十九；风云郁郁，愿中华民国，继自今万岁千秋”，虽言简而难不令人动容。

烈士祠南边便是武昌城内最大的城中湖——紫阳湖。她虽没有东湖的疑海听涛之巨象，但却拥有更加令世人瞩目的历史。在湖的东岸，便是首义发难的第八镇工程营营房，东南岸不远便是楚望台军械库和起义门。加上北岸的烈士祠等，围绕这一池波光，集中了众多首义旧迹。在这其中，紫阳湖东北岸距离烈士祠不远处，今紫阳公园内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亭子，名曰“胜利亭”。亭内立有一块不大的石碑，上面并无太多碑文，径书“民军起义国庆碑”八字而已。这样一块在今天显得颇为冷落的石碑，其背后承载的文化历史意义，却是世界级的。这块碑正是民国元年双十国庆留在武汉的真实见证物。“民军起义国庆碑”，这简短的几个词语的组合，却彰显出了一个伟大而深远的宣示：我中华民国之国庆，是以民军起义为国庆。这个神圣的国庆是献给那些为实现共同的梦想而起的伟大人民的，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新起点。这样一块纪念碑，完全可以与美国列克星敦独立纪念碑、法国巴黎攻占巴士底狱纪念碑比肩，可傲然雄立于整个亚洲而不朽。



首个国庆节之后，中国的情势却并不那么光明，首义之区武汉也同样如此。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武昌城“起义门”、“聚义门”被重新复名“中和门”、“通湘门”，据说是因段祺瑞认为这两个名字“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曾经动议在武汉修建长江大桥以作为辛亥首义纪念桥的构想，也因为钱都用于军阀混战而化为了泡影；袁世凯称帝时，“民军起义国庆碑”也一度遭到毁损。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辛亥革命时仁人志士所怀揣与追求的那个真正的民主共和之梦，自然不会是掌握权柄的政客所真正感兴趣的事物。

民国十五年夏，国民大革命的浪潮伴随着北伐军的行进开始席卷南中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便兵临武汉。在随后的战斗中，长江北岸的汉口、汉阳分别于10月6日和7日攻克，而8月底便已被包围的武昌城，由于城墙坚固而久攻不克。不过，武昌城战事的胶着似乎并不影响国民政府和北伐军在长江北岸阳夏二镇的热烈情绪和昂扬斗志。在占领汉口的当日，汉口便爆发了数万群众参加的反英示威游行，抗议万县惨案。游行群众包围英租界，抗议口号声震耳欲聋。而到了9日，北伐军总司令部决定次日上午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举行国庆市民大会。双十这天，市民大会如期举行，而正是在会上，突然传来了一个大好消息：吴佩孚军缴械，武昌今晨已克复！顿时全场一片欢腾，气氛热烈至极。武昌城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在武昌首义十五周年日这一天北伐军克复武昌，自然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巧合。路透社描述了当日汉口的情形：“……民众大会游行街市，庆祝国庆纪念日，各机关均悬灯结彩，全城之南军旗帜蔽满天空。”这次市民大游行，“由后城马路直下，至交通路出猪巷，抵后花楼正街直上桥口，转湾上马路直下满春”，从英租界开始横穿了汉口市中心最繁华的街区。直至夜间，仍有市民“提灯游行”，人潮不散。这一天的汉口出现了久违的市民热潮，以至于紧张不已的英租界当局不得不全天戒严防备意外。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这样评论这一次武汉的双十：“真正革命的势力自民元年在武汉举行一次国庆纪念以后，一直今年（十五年）国民党的势力因

战胜吴贼，又在武昌举行十五年的国庆纪念节。在今年的纪念节当中，比以前十四个年的国庆纪念，其人民欢欣鼓舞之热烈，当胜过万万倍。”

尽管武汉的第十五个双十节，在一次空前规模的群众性狂欢中度过，不过这并不能掩饰随着国民党时代的到来，双十在包括武汉在内的全国范围内，悄然发生着内容上的变化。自诩为“真正革命实力”的国民党，在随后的“训政”时代中，建立起了一套民国以来最系统和强势的意识形态体系。在这套体系之中，领袖和政党的崇拜开始泛滥起来，越来越多的东西被奉上神坛。在这样的背景中，纪念孙中山开始成为了双十节的主题。

这里不得不提起一个在武汉的城市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公园——首义公园。这座以最具武汉城市特色的“首义”为主题的公园，始建于1923年，是武汉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市民公园。章太炎在1922年就提出了兴建首义公园和首义纪念碑的设想，不过日后建成的这座公园内竖起的第一座纪念碑，却是一座“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与此同时，武汉市内的各种符号化的“中山”开始涌现：汉口市第一公园改为“中山公园”，国立武昌大学改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同时政府订制了两尊孙中山铜像，分别安放于武昌阅马场红楼前和汉口三民路口，而武昌城墙拆除后新建的马路也被命名为“中山路”。“中山”的大量出现，其主观动机显然并不仅仅只是弘扬中山先生事迹和精神那么简单。当武汉的双十节中，“中山”几乎成了唯一主题的时候，某种偏差已经显而易见地发生了。

虽然在北伐之后的十年的时间里，武汉也在城市发展的众多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有些甚至是举世瞩目的，可在这段漫长的“训政”时代中，这座骨子里流淌着澎湃热血的城市，确实平静了十年。不过，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始，武汉再次沸腾起来，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1937年底南京沦陷后，武汉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战时首都和抗战指挥大本营。如果说1927年的那次首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有名无实”，那么这一次的武汉，则可以说是“有实无名”。在随后10个多月的武汉抗战时期中，武汉不仅成为党政军要员和国共两党高层人士的云集之地，更成为了全国文化抗战和全民动员的中心。

也正是在这一段峥嵘岁月中，武汉度过了第二十七个双十节。尽管这一年的夏天，“保卫大武汉”的热潮高过了这座城市的温度，但9月以来，武汉周边战局已逐渐吃紧，当月28日夜，长江上的最后屏障——武穴田家镇要塞失守，武汉门户洞开。面对严峻的局面，紧张严肃的情绪也逐渐弥漫在市民周围，武汉似乎已成了沸鼎危巢，就连当年的中秋节，市民中也“并无往年享乐景象”。然而就在双十前夜，前线开始传来胜利消息，中央社称“直至深夜，市民犹向本社探询，其期待胜利之热烈情绪，实非楮墨之可形容。”双十当日，晴空万里，上午九时许，薛岳兵团在赣北取得万家岭大捷的确切消息传至武汉，全市之前的严肃紧张顿时一扫而空，转而进入了空前的沸腾浪潮之中。《新华日报》在“武汉狂欢纪念国庆”的醒目标题之下，报道了这日武汉的盛况：“这个消息似个火把，立刻燃着了汉市人们的心……汉市的民众为这个胜利的消息兴奋得发狂了，到处贴着捷报，到处响着鞭炮，电声公司更在它的三层楼上装置了扩音机，播送《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当那雄壮的歌声发出，每个从它前面走过的人都像被音乐调整了步子，不后退的向敌人阵地冲进一样”。汉口三民路总理铜像、武昌彭刘杨三烈士纪念碑等纪念地，成为了鲜花和游行群众的海洋。到了下午，汉口市内从兰陵路口至民权路口的沿江路上，站满了欢腾的民众，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乘坐军车，检阅了这数万人的队伍，其所到之处，欢呼不绝，声彻云霄。入夜之后，游行群众依然热情不减，再次横穿汉口市区，聚集到三民路总理铜像前高唱歌曲。还有众多民众在不同的地点举行了军民联欢会，

气氛蔚为热烈。

尽管这一年在抗战的特定历史条件中，国民党政权下的诸多问题被暂时掩盖和忽略，双十国庆中自北伐之后一直存在的某些偏差甚至在此时被空前放大，但这样一些形式上的遗憾，并不会有损这一年武汉双十在历史上留下的空前生动鲜活的气息。那些空泛沉闷的政治教条和偶像崇拜，在这一年特殊的时代洪流中，所承载的更多是城市民众的热烈情绪。正是他们发自内心所涌流出的对城市、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真正回归了双十的本真，也铸造了这一年双十国庆留在城市历史中的不朽。

民国二十七年武汉的双十，成为了继民国十五年双十之后的又一次在全城民众大狂欢中度过的国庆节。同样是适逢军事上的捷报传来，同样是全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海洋，而此次胜利之宝贵，更显得尤为令人兴奋。尽管万家岭大捷这样的局部胜利，并不能扭转武汉行将沦陷的大势，但在光荣地领导亚洲反法西斯运动十个月后，这个亚洲明星城市在属于自己的独特记忆——双十的历史书页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8年双十之后不久，武汉即陷于日伪的殖民统治长达七年之久。当大家终于等来品尝胜利的果实之时，却又发现这短暂的欢乐很快在内战的阴云中消散。1948年10月10日，第三十八个双十如期而至。此时长城以外，“辽沈战役”正在火热进行，历史正处在决定南京政府命运的关键时刻。这一年的武汉双十，当局自然仍旧要举行规模隆重的“纪念大会”，不过从这一年辛亥元老李翊东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对于双十节的感想》中，我们却能够读出些别样的意味：“我从每个国庆日所发表的文字来看，重视武昌首义的渐渐少了。三烈士的姓名简直没有人齿及，再看事实的表现，三烈士的坟墓没有建个碑，坟墓在何处也少有知道……在武汉三镇看不出什么纪念武昌首义的东西，只有一个烈士祠，而且自命为首义元勋、党国的要人，还要把它毁灭……烈士祠的祭祀，有点难为情，因为我们穷同志无力置点祭产，一年一度的双十节的祭费，还要作乞丐式的向外募化，哪有钱为烈士做神龛呢！所以每到临祭时，只有拿一张破条幅，铺上几张报纸，摆着烈士的牌位……”言辞间对湖北、武汉地方当局长期漠视辛亥历史和相关遗迹做了辛辣的讽刺。同样是在这一年的双十节，辛亥首义同志会在武昌阅马场重建了拜将台纪念碑，其上的落款也成为了这个组织在武汉的最后见证物。同一天，红楼内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名为“武昌辛亥首义后裔联励会”。从“同志会”到“后裔会”，一个不曾预想到的谢幕和一个乱世中的新生，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个历史的暗示：一个时代即将过去。

对于武汉来说，辛亥首义毫无疑问是三千年建城史中最为光彩照人的亮点之一，而从那以后，属于武汉的双十记忆，也自然应当是这座城市最为自豪和珍视的精神财富。然而我们回首近年来的种种故事，却倍感遗憾地发现，众多珍贵的城市财富，在时代的浮尘中，不断以令人遗憾的方式谢幕。

百年春秋，奄忽已矣。一百年的时光虽云漫长，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也不过是白驹过隙之一瞬。这一百年里，世界发生了沧桑巨变，中国更是如此。而在这风云百年中，亚洲首义之区武汉也同样经历着惊天变化。一百年前，四十米高的暨济水电公司汉口水塔在后城马路茕茕孑立，如同汉口这艘航船的巨大桅杆，傲然俯瞰三镇全貌。一百年后，无数高耸入云的摩

天大楼早已将这座城市的天际线一次次改画。不过，一座伟大的城市之所以震撼人心，绝非仅仅在于这些单纯物化的表象，而在于其承载的那些令人动容的历史文化和情感精神，以及它们的延续和传承。一位武汉作家在辛亥百年前夕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城市如人。一个人的一生可能很平凡，但总有一段岁月精彩难忘；一座城市，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她可以有物质和人文方面的种种缺憾，却惟独不能缺乏非凡的经历，这是城市之魂。”

民国时期被辛亥老同志李翊东竭力保护下来的辛亥首义烈士祠，在上世纪80年代被完全拆除，目的仅仅是为了兴建数栋外观极为普通以至于丑陋的住宅楼。近期，这些房龄20来年的建筑又被全部拆除，改为绿化广场。当年的辛亥首义烈士祠旧貌，如今仅余一个牌坊在路边孑立。

同一时期，紫阳湖畔的首义鸣枪发难处——第八镇工程营营房也被拆除，几年之后，有关部门方在原址建起一座被后期居民楼包围的小小的纪念碑。



米远的另一幢老建筑，却被有关部门用偌大的招牌标注为“俄国巡捕房”。

2005年，武昌首义路上的一处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清末张之洞兴办湖北新军新学，为招待外国教习、教师而修建的“鄂园”旧址被夷为平地。数年后，有人看到其在几十公里之外的黄陂木兰山一带“复建”。

2009年夏，汉口江岸机务段附近的一个历史超过百年的“转车楼”铁路转盘被完全拆除。这一百年铁路遗迹不仅是武汉铁路史的珍贵历史实物，更见证了辛亥首义后民军和北洋军的首战——阳夏保卫战刘家庙战役，以及十多年后的“二七大罢工”。这样一处珍贵的近代工业、交通和革命遗址，在有关专家一再疾呼之下，仍被完全拆卸一空，全部的金属部件都被当作废铁变卖。

还是这一年的冬天，汉口市内当年的亚洲反法西斯文艺圣地——交通路的全部老建筑，以及武汉近郊抵抗日军的最后堡垒——蓬字守望台，这一文一武两处“保卫大武汉”的重要历史见证物，都被完全拆除。来自专家学者、两会代表、市民网友等等的众多呼吁，同样未能起到挽

90年代初，包含湖北共进会机关旧址的汉口原俄租界宝善里被全部拆除，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宝善里失慎的历史场景，再也无从凭吊。其原址荒芜多年后，方建起了一栋高耸的商品住宅楼，名曰“XX大公馆”。

也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原俄租界内的俄国巡捕房也被拆除。当年正是这个建筑里的俄国巡捕闻声前往宝善里，导致了彭刘杨三烈士的被捕和武昌起义的提前发动。而在俄国巡捕房被拆除后多年后，与之相隔几十

救它们的作用。

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这是武汉之痛，更是难以挽回的城市遗憾。物质层面的文化遗产被抹去，其更深层次所反映的是城市记忆、文化与精神的断裂。漫步在最近数月的武汉街头，我们不难感受到浓烈的“辛亥”气息，几乎所有的房地产项目的工地围栏，都挂上了与纪念辛亥百年有关的宣传画。然而这些如风一般即来即去的临时装饰，能够承受这个百年的历史厚重，表达百年辛亥对于武汉而言的深刻内涵吗？在风云变幻的百年岁月中，武汉已经度过了99个双十。这其中既有波澜壮阔，也有平静无声，但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基本启示：对于武汉而言，双十是属于市民的最高精神礼拜。她的诞生来自伟大的辛亥首义，而她绵长的生命力则来自于市民情感。那些最为闪光的双十记忆，无不是由市民创造的。正是武汉市民在漫长的岁月中，在首义精神的旗帜下，不断把他们的乡邦之情、民族之爱熔铸进双十的文化内核之中。双十让这座城市回顾自己的光荣历史，让她的市民热爱她，为她感到骄傲自豪，更决心要为呵护、光大自己的城市而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承载着伟大城市记忆和火热市民情感的文化遗产在这个时代中的灰飞湮灭，不能不说这是武汉城市精神内核的受伤。一旦双十退化为一种单纯的大兴土木或口号、仪式，而脱离了市民的情感认知，那么双十之于武汉而言的真正意义，也就遭到背弃了。

人类文明史上，永远充满了这样的辩证关系：有些漫长延宕的时光，放入整个历史中，也化为了无足挂齿的一瞬间；有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在历史上却成为了漫长的永恒。

对于武汉而言，那些珍贵的双十记忆，便应永远成为这样永恒的瞬间。

青天白日，台湾来鸿

青白纪

潘毓刚教授谈中国教育改革和留学生问题

编者按：潘毓刚教授于2011年9月23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我的失败不可以复制”的演讲，演讲结束后接受哥伦比亚大学震旦社同学采访，主要就中国教育改革和海外留学生发表看法。潘教授生于大陆、长于台湾、执教美国，是在美华人的杰出代表。曾应邓小平之邀担纲中科院名誉教授，参与大陆教育改革。



潘毓刚教授，1986—1990年连续两届任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主席。该会成立于中美建交前的1977年，首任会长是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潘教授在任期间是全盛时期，在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旧金山等地建立了14个分会，会员多达万余人。华协在为增进华人团结、争取和维护在美华人地位和权益，促进中美科技、文化交流，推动中美建交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教育改革

我认为一个人民负责的政府应给所有国民受教育的平等机会。例如家境贫困的学生，只要他能考上大学，政府就应该通过贷款或扶贫奖学金等各种方式，让其不会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不能入学。

大陆的高考制度有利于大城市居民子弟而对贫困农村子弟是极不公平的歧视。台湾近年来的教改由一批海归学人在不了解本地社会背景和人情下把外国一些表面上的制度硬搬来用，使得教育愈改愈糟也愈不公平。

中国教育改革要从体制改革开始，学校行政人员应为科研教学人员服务而不是去“管”“卡”科教人员。入学考试制度及考试试题要改革，教学方式、教材也应改革。

留学生问题

从留学生学成归国的历史看来有一批留学生回国确实发挥很好的作用（例如影片《五星红旗飘》所述有关二弹一星的故事），但也有许多留学生不了解本国国情，出国后对外国真实情况也不够了解，回到祖国夸大自己在国外的成就，没了解外国许多精髓，只把看到的国外许多表面现象作为国外先进经验，盲目引进推广。另外我也不赞成让高中或初中毕业的留学生独自出国留学，我接触到从大陆和台湾来的小留学生，多被西方社会洗脑，将来成为洋奴买办的机会很大。例如有人提倡大学要用全英语教学，办教育要依市场经济规划，看了让人啼笑皆非。

我们早期留学生曾在美国办过两个刊物，一份是在美国编撰在台湾发行的七十年代初办的《科学月刊》（林孝信是联络人，我是自然科学第一任总编辑，现已搬回台湾编辑发行）。七十年

代末，我们早期一批留美学者在美国办了《科技导报》，介绍科技新知，最初在美国编撰在中国印行，我任总联络人，后来这杂志搬回国内变成中国科协的刊物。这两个刊物都代表我们早期留学国外的学人报效祖国所尽的一点心力。希望后学能够再接再厉，传承在美华人留学生办

黃克武博士專訪

辛亥革命的論述與其政治意涵

編者按：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向來是兩岸三地華人學生必修的歷史課題。然而，除了武昌起義，孫中山和同盟會的參與，各省獨立，中華民國建立以外，我們所知的似乎甚少。事實上，兩岸史學界早在1960年代起，已對辛亥革命的歷史重新估量，盡力擺脫兩岸政權對這個歷史課題的限制。到了當下慶祝辛亥百年的前夕，兩岸政府又在密鑼緊鼓，將辛亥革命變成對外宣示正統，對內謀求共識的利器。我們有幸訪問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任黃克武博士，和他談談兩岸辛亥論述的變遷與其政治意涵。



記：記者(楊秉業)

黃：黃克武博士

記：黃博士，可否簡單介紹一下兩岸分治之後，辛亥革命的論述有何不同的地方？

黃：國民政府遷台以後，國民黨為了支持其政權的正統性，各種學術研究幾乎都由官方論調來主導。國民黨的革命史觀圍繞著孫中山先生以及同盟會等革命團體，卻忽略了其他革命領袖與社團，如湖南的華興會與浙江的光復會及立憲派的角色。國民黨透過教育與宣傳機制強調辛亥革命是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從光緒二十年（西元1894年）的興中會開始到光緒三十

一年（西元 1905 年）的同盟會，革命黨人經歷十一次革命，前仆後繼終於建立民國。

至於中共的史觀則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的階段論」。他們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延續到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這是所謂的「舊民主主義」的革命，由於推翻了封建專制制度，辛亥革命是有功的。但是，辛亥革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因此具有「歷史的局限性」。接續是 1919 年的「五四運動」，帶來了民主與科學，也造就了中國共產黨。成立於 1921 年的中國共產黨，自認繼承了孫中山民主革命的遺志，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于 1949 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見，國共雙方對於辛亥革命的歷史詮釋，都是為了闡明自身政權的歷史合法地位與政治正當性。

記：那麼台灣的政府到現在有否維持這個官方立場？

黃：台灣跟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最大的不同是，台灣大部分民眾視來台的國民政府為外來政權。因此，以本地學者為首的史學派別通常都不賣政府的帳，享有一定的獨立自主性。加上國民政府在六十年代大力推動台灣大學生出國留學，學的不限於數理、科技、工程，也包括文學、哲學、歷史。第一代出國的史學家以郭廷以為中心。他很受胡適的器重。他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創辦了近代史研究所。這個時期的中國近代史的特徵，是以東南大學的史學為基礎，後來結合了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相關學科。哥倫比亞大學主要是口述歷史，而哈佛大學主要是費正清開創的海外中國學這一派。這三種力量結合在一起，為台灣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開創了一個新天地。郭廷以為的學生，幾乎人人都利用福特基金會的錢到國外去搜集檔案、攻讀學位。這批人自從 1950 年代中後期進入「中央研究院」後，就開始研究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等，花了二、三十年的時間對辛亥革命前因作了深入的考察。到了 1980 年代，國民黨對於國內學術研究進一步解禁。台灣史學界亦因早前跟國外建立學術關係，有不少研究人員到歐美、日本留學，拿到國外的學位，也就跟國外的漢學界建立了直接的聯繫。得到了國外的養分，台灣的辛亥革命研究也就更有活力掙脫官方預設的框架，自由發表研究所得。

記：對不起，我想再請教一下，政治力量對台灣研究辛亥革命的影響。剛才您說過，部分學者根本不認同來台的國民政府，但他們斷斷不能否認辛亥革命成全了中華民國，也就是說，他們不能以貶低國民黨在辛亥革命的領導角色來否認國民政府管治台灣的正統性，兩件事彷彿不能相提並論。

黃：你說的對，史學界帶有的反國民黨思想，可以說是學者們反國民黨及其官僚體制空降台灣的副產品，就是說，台灣學者反對國民黨在台灣的管治的情感，渲染了他們對辛亥革命國民黨角色的研究。但你提到的政治力量對辛亥革命研究的影響，在 2000 年政黨輪替以後更為明顯。民進黨上台以後，配合其「去中國化」、「去國民黨化」的政策，大副削減中華民國國史館和中央研究院對辛亥革命研究的資助。學者們發表研究所得，或是參與公開論壇、兩岸交流等等統統都遭腰斬。直到現在，國民黨重掌政權，對研究辛亥革命也是忽冷忽熱。比方今年辛亥百年，我曾問過中國國民黨党史館主任邵銘煌主任，要不要主辦活動。他說抱歉，我們沒有能力也沒錢。對國民黨來說具有開創意義的最重要的辛亥革命，國民黨已經無力來

籌辦。至於何以出現這種無力感，我想等一下才回答你。

記：沒問題！那麼台灣史學界在脫離官方論述之後，對辛亥革命有何主流理論？

黃：要瞭解近代台灣對辛亥革命的論述，我必須要介紹張朋園先生出版的《立憲派與辛亥革命》（1969）。在此之前很少有人仔細研究立憲派，以及辛亥革命與立憲派之間的關係。通觀全國各地辛亥革命前後的發展，張先生發現辛亥革命爆發之後，主要是依靠「進步的保守分子」--立憲派士紳--的支持，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獲得全國大多數省份的認可。四川省諮詢局議長蒲殿俊不但向清廷請願立國會，且領導護路運動，罷課，罷市，加速了革命的爆發；湖北省諮詢局議長湯化龍在武昌起義之後即與革命黨合作，通電各省，呼籲回應獨立；湖南省諮詢局議長譚延闔在革命爆發後，起而擔任都督，使湖南在短期之內恢復秩序。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廷曾說：許多在革命前屬於君主立憲派的人，在辛亥時期與革命派合作。事實上，在促使帝制的崩潰中，他們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對立憲派的活動懵然無知，我們對辛亥革命的過程是不能瞭解的。

汪榮祖先生對於江蘇地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值得參考。他的研究同樣顯示了立憲派在建立民國過程中的重要性。在武昌辛亥革命爆發之後，江蘇省是第一個回應且宣佈獨立的省份。以張謇為首的立憲派人士為什麼要宣佈獨立？不是因為他們支持革命黨的革命理念。相反，這些人非常怕革命黨。立憲派士紳宣佈獨立最重要的原因，其實是為了自保。因為辛亥革命造成較大的社會動盪，其根源要追溯到晚清的一些重要變化：從太平天國起事之後，中國東南一帶人口銳減，使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中一環，就是地方士紳為了維護治安而慢慢地掌握了地方上的權力。由於晚清有相當多的賠款，特別是《辛丑合約》，賠了白銀四萬萬（編按：「萬萬」是億的舊稱。）五千萬兩，幾乎是一人賠一兩。這樣的巨額賠款直接就攤派到各省，給地方財政造成了很大負擔。換言之，清末財政困境使許多人生活極不穩定。這些人有的就像魯迅筆下的阿Q那樣不自覺成為革命軍的基礎，而有的就變成社會動盪的根源。所以，辛亥革命之後，通過江蘇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出，這些士紳宣佈獨立是為了自保。他們希望在革命軍于武昌起義成功而中央沒有辦法控制局面的時候，可以依賴自己的力量保障身家性命，這才是他們宣佈獨立最根本的原因。他們有一整套地方建設的構想，包括實業、教育、慈善、政治等方面，還請荷蘭專家協助開發海埔新生地，蓋了中國第一個博物館等。誇張一點說，他們可謂當地的「土皇帝」。辛亥革命爆發之前，他就已是地方實力人物，透過參與政治進入諮詢局、資政院，成為地方議會的領袖。由於這些立憲派人士擔心革命後的社會動盪，起而自保，革命才會成功。辛亥革命之後促成政權和平轉移的南北議和，也主要是在立憲派人士努力下才獲得成功的。

記：台灣學界現在的辛亥革命論述並不如國民黨所說的完全由革命黨所主導；也不像有些中共史家所說的，是資產階級革命了。

黃：對！現今台灣史學界普遍認為辛亥革命有長期的思想醞釀過程，參與者來自不同的階級，並為了不同的目的參與進來。我們可以這麼說：革命成功乃彙集各種勢力形成，其中革命黨人多受理想激發，揭竿起義，立憲派人士則或為自保，或為維繫秩序，起而回應。辛亥革命

就在新舊勢力妥協之下獲得了成功。民國之後，在實施民主過程中所出現的困難與挫折，亦部分源於此一困難的妥協。

記：剛才您提到立憲派對辛亥革命的成功非常重要。從我過去受的中國歷史教育來看，簡直是不可思議。在我心目中，立憲派的代表是梁啟超和康有為，當年孫中山曾把自己的革命藍圖給梁啟超看。梁啟超認為滿紙荒唐。自此，革命黨與立憲派越走越遠，更有立憲派阻止革命進行。

黃：哈！我想不到台灣當年的官方論述也在殖民地香港的教育系統裡出現！我相信這與當年負責制定香港教材的老師、學者、官員們都同情國民政府有關。殖民地教育官員當然儘量置身事外。加上歷史教育在東亞地區過去的二、三十年來不受重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編訂的教材沿用至今，才會出現這個有趣的蕭規曹隨。

但你提到的梁啟超，的確在被發現！梁啟超在國民黨的。1960 年代，張朋園先生台灣世界書局出版這本書負面文字都刪節掉了。這可盾在 1960 年代仍然存在。命思想，其實是在與《新民的。雙方就民族、民權、民命黨人的革命理論能夠得命黨的革命理論不是汪精中山一人憑空建立起來，而逐步形成的。張的看法表達而這種不滿又是跟台灣長期



梁啟超

地位，將孫中山的思想作為意識形態宣傳的主要內容有關。當時在國民黨主導下，辦了大量的孫中山思想研討會。他們一向誇張地宣傳孫中山對現代中國獨一無二的影響。沒錯，孫中山與同盟會在清末面臨最大的挑戰其實就是來自梁啟超，但兩者並不完全互相排斥。從梁的視角去考察，孫中山的思想有問題。民族革命從清末「驅逐韃虜」到民初改為「五族共和」，說明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是一種革命的策略性考慮。這樣一種論述，對國民黨的國家建構殺傷力很大。當時梁啟超就對革命黨人說他主張的是一種大民族主義，是在共和的旗幟之下各種民族都有同等的政治參與權利和平等發展的資格，因此並不存在國民黨所說的反對共和。至於民權議題，立憲派與革命派終極方向是一致的，只是立憲派認為應以和平漸進的方式實施君主立憲，然後等時機成熟再進入民主共和，故不宜革命。民生議題方面，立憲派較傾向提高生產。孫中山的民生理論傾向社會主義，要實施土地國有，要以俄為師。當然，張先生當時的看法受到國民黨的猛烈抨擊，禍延他寫的教科書《中國現代史》中部分內容遭國民黨大改特改。幸好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比較開明，才允許原版推出市場。否則台灣學子在思想解禁的 1980 年代，也得跟你們用同一套學習辛亥革命了。

台灣新的學術潮流裡再的官方立場裡是反革命寫《梁啟超與清季革命》。時將其中涉及國民黨的以顯示梁與國民黨之矛張先生認為同盟會的革叢報》的辯論中逐漸形成生三大主題的辯論，讓革到更完滿的建立。所以革衛、胡漢民等，更不是孫是在梁啟超的挑戰之下了對孫中山的一種不滿，

以來過度抬高孫中山的歷史

記：中國大陸方面有沒有相對應的改變？抑或依然受到官方觀點的左右，未能離開「社會主義階段論」的規限？

黃：中國大陸對辛亥革民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幾乎完全為文革服務。當時為配合「破四舊」、摒棄儒家思想的浪潮，辛亥革命被描述為一場儒、法之爭。被貼上「反儒尊法」標籤的辛亥人物章太炎大受稱讚，甚至出現抑「孫」揚「章」的情形。文革後，隨著各方面學術研究的解禁，辛亥革命研究猶如雨後春筍。1977年，《歷史研究》的《辛亥革命是儒法鬥爭嗎？》；《四川大學學報》的《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這兩篇論文都否定了「四人幫」踐踏歷史研究，歪曲辛亥革命史實的行為。但當時只是著述的解禁，而非觀點的解禁。當時的學者繼續以共產黨的歷史觀看待辛亥革命，把辛亥研究歸類到中國資產階級的研究上去。及後，大陸史學家開始出席國際研討會，有機會與台灣、海外的專家交流，才有一部分學者對辛亥革命作創新的猜想。其中變化最大的恰巧也是對立憲派的歷史評估問題。

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框架裡，梁啟超、嚴復、張謇這一派人，在1949年以後因為屬於資產階級改良派，在文革大潮之下幾乎都被打成黑色。從1990年代開始，立憲派人物才獲得重新的評價。兩年前，我到江蘇南通、海門參加「第五屆張謇國際研討會」。該會大力把張謇打造成地方旅遊的品牌。張謇已變成一個不但是大家可以接受，而且是大家非常肯定的時代先知。張謇從改革開放開始，到最近的五六年內迅速地被平反。我們如將張謇的相關評論排列下來，可看到平反的過程非常清楚。嚴復也是如此。我從1995年開始參加福建省嚴復學術研究會。他們為嚴復這樣一個歷史人物做學術研究、宣傳、推廣，豎塑像，建公園，發行郵票，編電視劇……各種各樣的活動，重新把過去被貶抑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負面性人物打造成正面的改革開放時代的先知。

記：我們可不可以說中國大陸史學界對辛亥革命的研究漸漸與台灣及世界接軌？

黃：這說法不是完全正確。我應該強調立憲派人物的評價，在中國大陸的辛亥革命研究只屬一小部分。這一點跟我們在台的學者是相反的。我們對辛亥革命的成因最感興趣。中國大陸方面，還有好一部分的研究集中於辛亥革命是什麼，另外是辛亥革命是否成功。前者大陸官方依然嚴格規定，辛亥革命應該被定性為「資產階級革命」。即使江澤民、胡錦濤先後指出辛亥革命為「民族民主革民」，但學者的回應只是「資產階級的民族民主革命」，可見學界依然實行一定的自我約束。至於辛亥革命是否成功，其實就是要看孫中山的理想是否落實，即民族、民權與民生，是否在華人社會落實。我相信中共必定不會在短期內放棄在這問題上的主導權，尤其是「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行至今，幾乎完全背離了共產黨對於民生問題的論述，基本上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因此，為確保政權的正統性，中共必須自稱是孫中山民生思想的唯一繼承人，其所作的一切續一實現了民生思想。相反，台灣的政治在他們的論述裡出現了腐化問題，強調李登輝、陳水扁時期的貪污情況，證明由中共領導的政治模式才能復興民族，保障民生，完滿落實辛亥革命的精神。

記：北京爭取成為辛亥革命精神繼承人的姿態，我相信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今天特別有意思。

黃：對！中共將辛亥革命百周年與建黨九十年的慶祝結合起來。從大陸各省積極籌辦相關活動，甚至籌拍《建黨偉業》、《孫中山》、《辛亥革命》等電影，邏輯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中華民國，成為歷史的正統。從祭拜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開始，參與者不止大陸各地人士，也有港澳人士，海外華人，甚至透過管道邀請台灣當局共同合辦，對外塑造兩岸走向統一的意涵。

記：台灣當局對此等舉動有何回應？

黃：馬英九政府對這些邀請不以為然。他在 2010 年五月已經名言兩岸各自籌辦紀念活動。其邏輯是如果合辦，將形同兩岸同屬「一國」，不僅在國際間造成混亂，在台灣內部，國民黨必遭在野黨批判，尤其是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已被普遍認為是親中賣台了。合辦辛亥百年活動，也得超越目前兩岸框架，在馬政府先經後政的談判架構下，對岸若願意承認「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等於超越九二共識，代表兩岸逐漸進入「政治對話」。這是超越現實的！因此，馬政府籌辦的活動著眼點在於「建國一百年」，而非「辛亥一百年」。又為避免過分刺激對岸，又改為「精彩一百年」。這個舉動政治上是明智的，既能安撫對岸，又可淡化 1949 年前中華民國歷史的成份，減弱民進黨的攻擊。雙十慶典將會是「精彩一百年」的重頭戲，屆時會邀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參加，強調愛與和平，為中華民國未來的第二個一百年作準備，重點明顯放在將來，而非過去，跟中共繼承大統的歷史思維相反。

記：那麼台灣當局是否已在學術研究和政治紀念兩方面徹底與辛亥革命劃清界線？

黃：倒也未必！以上所說的慶祝計畫在 2010 年已經面世。踏入 2011 年，台灣內部開始熱烈討論 2012 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將其台獨主張軟化成「不否定中華民國，但兩岸屬一邊一國」。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早前提出「中華民國為流亡政府」，就是將台獨透過這個主權獨立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借殼上市」，令台灣獨立變成維護已經獨立的「中華民國-台灣」，坊間稱之為「獨台」論。如此看來，國民黨政府原先的「精彩一百年」便出現問題。原因是「精彩一百年」淡化 1949 年前的歷史，強調遷台後的台灣如何奮鬥，在艱苦的國際形勢中突圍，跟「獨台」相去不遠。馬英九惟有急忙加插歷史研究的活動，例如我院在十月將與國史館合辦研討會。政府又以兩百萬台幣籌拍《國史影音大系--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的誕生》，務求與「獨台」分開。

記：看來兩岸的對於辛亥革命的論述真是同中有異，部分獨立於政治，部分又被政治左右，並非三言兩語所能盡述。

黃：對！歷史向來就是一個對話的過程。持不同看法的人用史料來證誠自己對歷史的論述。如果人類發明了時光機，有能力回到過去，史學就可以入土為安了。

記：謝謝黃博士今天接受訪問！

黃：謝謝你！

南天港澳，中西交融

南华纪

辛亥百年： 終結歷史悲情 實現民族復興

周建閩

編者按：《中國評論》的周建閩先生欣聞我們留學生自辦《新新青年》、凝聚海外學子，特以辛亥百年紀念文章作為寄語。周社長主辦的《中國評論》，溝通兩岸、融匯中華，也正是我們《新新青年》的宗旨，希望在未來的歲月中，《中國評論》能對《新新青年》更多提携！



周建閩，1955年8月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文革下鄉三年，又在工廠做工兩年餘，其後於1978年入讀廈門大學中文系。1984年又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1987年畢業，獲法學碩士。後入中國新聞社，在港台海外部工作，曾多次赴台採訪。現為中國評論月刊總編輯、中國評論通訊社常務副社長。

100年前的十月十日，辛亥革命槍響武昌城，現代中國歷史的閃電，劃破千年沉悶的封建暗夜，標誌著一個古老而又善於自我更新民族的覺醒和浴血淬變，成為二十世紀初中國最偉大的歷史事件。

辛亥革命的發生對於中華民族有著特別重大的意義和歷史必然性。自1840年以來，在西方列強現代化槍砲的侵略、欺凌、逼迫下，古老的中國被迫進入國家和民族現代化進程。對於延續了數千年農耕文明的封建中國而言，這個向現代化、工業化轉型的“千年巨變”來的是這樣的突兀，這樣的無情和冷酷，令所有國人都猝不及防。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屈辱、戰敗、割地賠款、簽訂不平等條約等等喪權辱國的慘痛記憶以及維新變法、君主立憲、洋務運動等失敗之後，中國的知識階層和各界民眾逐漸覺醒，他們意識到，中國要生存發展，必須推翻統治中國社會數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必須向現代化、工業化轉型；否則，國家必滅，民族必亡。

特殊的歷史境遇決定了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必然具有雙重性質：外抗帝國主義強權、內反封建專制統治；也就是“反帝反封建”。其最終目的，都只有一個：終結歷史悲情，實現民族復興。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辛亥革命揭開了現代中國翻天覆地的歷史進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無論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者還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者，都在苦苦探索、尋找中國的現代化之路，都在為實現民族復興而拋頭顱、灑熱血！

辛亥革命是偉大的。她的發生，既是中國人民對千年封建帝制黑暗、腐朽、無能怨恨的總爆發，又開啟了探尋中國自由、民主、富強的現代化進程。由此，二十世紀的中國，在960平方公里的國土上演出了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波瀾壯闊的大革命。

百年回首，這場由辛亥革命啟動的現代化進程終結了中國農耕文明時代，工業化轉型基本實現。中國的綜合國力一路上升，已經高居世界第二位。今天的中國，再也不是百年前任由列強瓜分、欺辱的弱國，而是備受世人尊崇、獨立自主的強大國度。

器物文明建設的成就，配套的是制度文明的正確選擇與探究。就“反封”而言，儘管辛亥革命使封建社會崩潰了，但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識觀念還殘留在中國人的心中，數千年的封建制度及其衍生的意識形態，已經內化到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行為準則中，壓抑和扭曲了中國人對自由、民主、博愛、人類大同社會的理想與想往。因此，如何找到能夠實現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文明制度、並將之改造成為適合中國國情與民情的社會發展理論與制度，就成為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發展的當務之急。在經歷重重艱難探索的實踐之後，中國人民最終選擇了一條將西方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道路，成功地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保障了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

應該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項偉大的制度創新。其獨特之处在於，她是建基於所有人類先進的思想觀念之上，而又正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和豐富的理論與制度體系。由於這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制度創新，其中充滿不確定性與高度複雜性，因此，這種創新與制度文明的建設必然伴隨著整個民族復興的過程。她的完善之日，也必然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之時。

國家統一，是辛亥革命遺留的歷史使命，也是現代中國偉大的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的一貫思想和畢生實踐的奮鬥目標。“復興中華、統一中國”，是孫先生念茲在茲的口號和政治信念。一百年過去了，中國的臺灣海峽兩岸至今未能實現統一，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遺憾。兩岸分離的背後，是外國勢力插手、干涉的結果；因此，臺灣問題一天不解決，中國自 1840 年以來的歷史悲情就一天不能終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就一天不能實現！

這個歷史任務，無可避免地落在今天海峽兩岸及海外所有的中國人及愛國者的身上。相信經過全體國人奮鬥，下一個百年到來之際，中國必然完成國家統一，中華民族也必然實現偉大復興！中國人的光榮與夢想，操之在全體民眾之手，同胞們，努力啊！

后记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敬告青年》发刊词。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陈独秀发表《新青年》一文。

1918年1月，《新青年》改成同人杂志，轮流编辑。

1920年9月，《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1926年7月，《新青年》停办。

《新青年》的一代人中，胡适留美，陈独秀、鲁迅留日。正是这一帮留学生，缔造了现代中国的雏形。当胡适在美国跟着夏含夷辅修汉学的时候，当鲁迅在日本跟着一帮无名小卒办着《新生》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他们的话语、他们的观念会如此的深刻的影响一个民族怎么说话、怎么想问题。

《青年杂志》之后96年、《新青年》之后95年，而有《新新青年》。回顾《新青年》的历史，不是要摆明我们的谱系，因为我们的谱系，比《新青年》还要长。

中国的第一代留学生、耶鲁的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1854年，容闳回国，向洪仁玕献治国七策，主持二期幼童留美，被革命党选作中国国会议长，践行“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那么，一百五十年后，我们应当扪心自问：今天的中国到达“文明之境”了吗？

中国的第二代留学生、康奈尔和哥伦比亚的胡适在《非留学篇》中写道：“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1917年，胡适回国，参与新文化运动，开拓自由

言路，出任驻美大使，担纲北大校长，在“数千年之古国”践行“久远之图”。那么，一百年后，我们应当扪心自问：今天的中国到底是以留学为“吾国之大耻”，还是吾国之光荣？

中国的第三代留学生、密歇根的朱光亚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浇灌出灿烂的花朵。”1950年，朱光五回国，投身两弹一星，不畏核子艰险，筹建中国工程院，呕心沥血，殒身不恤，真真切切的把“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那么，六十年后，我们应当扪心自问：今天的我们还会热血沸腾的回应祖国的“召唤”吗？

我们的留学，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存在？

我们的留学，到底是为了中国的文明、为了中国的雪耻、还是为了中国的召唤？或者说，为了逃离中国？

胡适之当年在哥伦比亚的时候，中国留学生还是凤毛麟角，并分裂成哥大与哈佛两派。哥大以杜威为宗师，实验主义，开拓进取，典型者如胡适，回国后投奔《新青年》；哈佛以白璧德为宗师，人文主义，文化保守，典型者如吴宓、梅光迪，回国后创办《学衡》。留美时代哥大派与哈佛派的斗嘴、回国后《新青年》与《学衡》的论争，而所斗所争，大抵形而上，偶尔形而下，今天看来，确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我们的胡适之先生，想必常常徘徊在绮色佳（Ithaca，即康奈尔所在地）旁、赫贞河（Hudson River）畔，思考着中国文化的转型，思考着容忍与自由，思考着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思考着中国将以何种姿态自立于世界。

今天的哥伦比亚，已经几乎被中国人占领了。胡适当年走过的寂寞小道，早已被行路匆匆的中国留学生搅拌的热闹起来。这批成长在经济腾飞年代的年轻人，有着更明确的目标和更进取的精神，他们不但行路匆匆的穿过校园、教室，也行路匆匆的穿过华尔街、世贸中心和联合国。他们的英语比胡适说的更溜，他们的举手投足已经渐渐和纽约这个大熔炉的城市完美的匹配在一起了。

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并不大习惯于行路匆匆和被热闹，倒觉得胡适之当年的寂寞小道更有意思，眼光所及之处，也不全在如何做美国达人，而是更多的投射到那个充斥着裸官和裸民的裸国。这一帮忙学习还忙不过来的家伙，居然要真枪实干的办起杂志来。他们脑中想到的，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譬如一十年代的《新青年》、二十年代的《学衡》、三十年代的《独立评论》、四十年代的《观察》、五十年代的《新观察》、六十年代的《自由中国》、七十年代的《美丽岛》、八十年代的《自由时代》。这些人的脑子里，还充斥着容闳的治国七策、胡适之的抗战外交、朱光亚的两弹一星，甚至还有马英九的哈佛保钓。大陆和台湾的书生论政基因，一下子在这帮人的脑中爆发开来，于是就有了今天大家读到的《新新青年》。从想法到实践，不过一个月时间，所以这帮理想青年，实在效率高的无可救药！

《新新青年》既然自称为青年杂志，那么撰稿人和读者群自然都以青年为主。即便是偶尔有

中老年人的涉足，那也不是板起脸来教训，而是笑眯眯的交流。本刊虽然草草创立，然而野心不小，无论大陆、港澳、台湾还是海外优秀华人，一应纳入彀中，视野开阔，视角多元。受到震旦纪的启发，本刊将版面根据地质年代名号划分为：震旦纪，刊载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访谈，以求震撼华旦；志留纪，刊载留美华人学生佳作，所谓志留，非志在留美，而是志在留学，志在留出实效；陆根纪，世界华人，以大陆为根，大陆学生，自当奋勉，方无愧赤县神州之誉；青白纪，谓中国大陆对面，尚有以青天白日为认同依归之台湾，为华人世界先进；南华纪，谓中华本土之南，有港澳焉，贯通中西。如是，则大陆、港澳、台湾、海外，一应俱全，一个不少。

本刊的创刊号主题为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百年。限于篇幅，辛亥革命跟海外留学生的纠结，其实远远不止于本刊所能展现。辛亥革命的精神领袖孙中山，本身就是当年的小留学生，手下的革命党骨干，如汪精卫、如胡汉民、如曹亚伯，均是留学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最为著名的林觉民与喻培伦，也都是留学生。袁世凯的部将中，如段祺瑞、如王士珍，同样是留学生。达成南北议和、清帝退位的双方代表，唐绍仪与伍廷芳，一个是留学哥大，一个是留学英伦。辛亥革命的开始和结束，全是留学生在运筹帷幄、纵横捭阖。

仅以哥伦比亚而论，这里走出的中国人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华民国史。在这里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有唐的女婿、中华民国历史上屡争国权的外交家顾维钧，有中华民国的财神爷宋子文，有民国时期蜚声海内外的实业家侯德榜，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更有中华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政论家罗隆基。。从哥伦比亚走出来的中国人，更是完整的勾勒出一部北大史。蒋梦麟、胡适、马寅初三任北大校长均出自哥大。中国的前行，每一步都离不开海外留学生的策进。这样一种使命，这样一种担当，历史性地落到我们的双肩。李敖奋斗一生的目的，就是决不当自了汉。中国的百年留学运动，波涛滚滚，前赴后继，如果留学只是为了镀金，如果留学只是为了跑路，如果留学只是为了个体的成功，那么一百年后，一千年后的中国人还是要不断地留学，不断的镀金，不断地跑路，不断地制造个人的跃进、集体的沉沦。这样的中国，是注定要被开除球籍的中国。

我们的《新新青年》，所孜孜以求的新新中国，是要让所有中国人都发自内心的去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不会定于一尊，所以能够容忍异己，这样的中国，不会恃强凌弱，所以能够善待友邻。这样的中国，使近者悦，远者来，宽容高于自由，自由高于政治，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这样的中国，有哪一个中国人不爱呢？有哪每一个中国人不被感动呢？

再次回到我们的留学老祖宗容闳。容闳毕生致力于西方文明的引进与中国文明的再造，可惜时乖运蹇，不见容于当局，最后客死美国。在容闳去世的前一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曾经邀请容闳归国，但未及启程，已然溘然长逝。《纽约时报》对容闳做出如下评价：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精神纤维都是爱国的。

我们的先行者，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的后来者，也会睁大眼睛审视我们是不是合格的榜样。《新新青年》的愿景，就是决不当自了汉，决不局限于各扫门前雪，不管故国霜。四

千余年古国古，是我完全土。如果我们选择裹足不前，那么明天的中国就是继续深陷在蒙昧的泥淖之中；如果我们选择大步前行，那么明天的中国就是让人尊重、让人骄傲、让人去爱的新新中国。我们怎样，中国就怎样。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朋友们，战友们，你暴戾，你浮躁，你怨天尤人，你满腹牢骚，唯一说明的一点，就是你希望改变。梦想与现实的差距，不止万万里之遥，然而如何在痛苦之中沉着自处，不沉沦，不悲情，用公平与正义的力量，开天辟地，横空出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新中国的命运，《新青年》休戚与共。

新新中国的前途，《新新青年》责无旁贷。

践行梦想，制造中国，请自《新新青年》始

《新新青年》
辛亥百年专刊 创刊号

关于本刊订阅、批评和建议，请发送 e-mail 至 chinaenlightenment@gmail.com。我们会将每一期电子杂志第一时间邮寄给您，也会开辟读者来信专栏刊载代表性读者声音。谢谢关注！

2011/10/10

《新新青年》编委会